

半月文選

吳鼎昌題

第一卷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出版

目 要

- 從軍學生的歷史使命……重慶中央日報
- 憲政與政治思想……張知本
- 對於戰後應具的認識……陶孟和
- 世界永久和平與中國經濟建設……蕭 鐸
- 中國工業化路線諸問題……沈志遠
- 特載：中西文明之異同……吳鼎昌
- 戰後工業建設與內遷廠鑛復員……齊植路
- 戰後我國農業應有之新趨勢……林邁陶
- 戰後建設借款論……高平叔
- 邱吉爾的副官小姐……魏彝譯
- 印緬戰區新影……范鶴元

貴州地方自治月刊社發行

半月文選 第一卷第三期 目錄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出版

- (半月) ● 一切爲了前線……………重慶商務日報 (七七)
 - (論評) ● 有不爲與有爲……………邵力子 (七八)
 - (論評) ● 從軍學生的歷史使命……………重慶中央日報 (七九)
- △△時文選萃▽▽▽

特載：中西文明之異同……………吳鼎昌 (八〇)

憲政與政治思想……………張知本 (八二)

對於戰後應具的認識……………陶孟和 (八七)

戰後復興問題 (輯特題) 世界永久和平與中國經濟建設……………蕭 鈺 (八九)

中國工業化路線諸問題……………沈志遠 (九一)

戰後後方工業建設與內遷廠礦復員……………齊植路 (九三)

戰後我國農業應有之新趨勢……………林邁陶 (九六)

戰後建設借款論……………高平叔 (九九)

台灣內幕 (續)……………李自修 (一〇二)

戰後如何處置日本？ (續)……………張尙之譯 (一〇五)

山水人物 邱吉嶺的副官小姐……………熊彝譯 (一〇三)

印緬戰區近影……………范鴻元 (一〇四)

半月文選

第一卷第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貴州省地方自治月刊社

社長兼發行人：尙 傳 道

主編：周 其 辰

沈 漢 廖德焉

編輯委員：趙季恆 周應華 蔣品源 黃國權 陳嗣山 周其辰

社址：貴州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委員會內

郵購處：本 社

零售處：貴陽各大書局

印刷者：貴陽中央日報社

定價：零售每册十二元 半年一十二元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期	三〇〇〇元
乙種	每期	一六〇〇元
丙種	每期	八〇〇元
甲種	半年	三二〇〇元
乙種	半年	一七二〇元
丙種	半年	八六四〇元

這一期

△因為現有製版的設備，不能克服「陰晴」所給予的困難，故本期時表照片暫缺，尚希讀者鑒諒！

△本期「一切爲了前線」一文，提醒我們處在民族生存鬥爭的時階，我們應該以「一切爲了前線」爲做事的準繩。

有不爲與有爲

一文，告訴我們應有「有不爲」的決心，然後才能「有爲」，更說明了「有爲」之「不爲」的步驟應該怎樣。

△「學生從軍」表面是抗戰熱忱表現的問題，而實際上具有多方面之意義，這一期

從軍學生的歷史使命

一文對此闡述甚詳，可以算是學生從軍問題的代表作。

△本刊在內容方面，如屬事實可能辦到的，我們總是儘量設法力求充實，這一期 吳主席之

中西文明之異同

一文，是在國立貴州大學的演講詞，也因為這，曾由本刊編輯委員薛科長品源不辭風雨特地到花溪接洽，費了很大的周折，才取得這篇講詞的抄稿，趕在本期刊載，俾使本刊的讀者得以「生觀」。

讀了這篇講詞，不獨使我們了解了中西文明異同的核心所在，同時告訴了我們「仁、義、孝、忠」的貫串理論，更指示我們要做文明國家之公民。第一要孝於親，第二要忠於國，第三要服務於社會，對人對事的哲學，這一篇講詞，實得復得。

第一期會刊有「中國革命憲政之範圍」一文，論述了中國憲政的性質，本期

憲政與政治思想

一文從神酒憲政治思想的源流，指出中國憲政應有的形跡，和應具的「靈魂」。更特別告訴我們研討憲政不能忽略了政治思想，希望讀者讀本文能同時參閱前一篇。

△戰後的建設是一種艱鉅的工程，推進的方式與路線更是費考慮的問題，本刊特地搜集了很多關於這方面的文字，這一册

對戰後應具的認識

世界永久和平與中國經濟建設

中國工業化路線諸問題

戰後後方工業建設與廠鑛復員

戰後我國農業應有之新趨勢

戰後建設借款論

共計六篇，除第一篇是一般說明對戰後應有的認識外，其餘的都是經濟方面，各篇都有獨到的意見。關於政治及其他的留在下一期刊載。

△印緬戰爭是「陰雲密布，風雨欲來」的形勢，但「風雨」何時來？却是一般極端注意的一個問題，本期

印緬戰區近影

一文，內容是開羅會議後的特稿，它告訴我們「風雨」是將來了！

貴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生方後加增· 月六年八十二：開時立創 ·源資州貴發開·

電報掛號：〇二二〇（貴陽）

地址：貴陽市南明區清鎮路
 電話：總公司 七七七八
 營業處 四七七九
 各廠轉

種八十二業事關有括包

·品產要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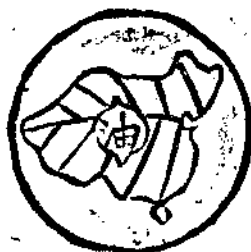
布油油化獅機黃企耐磨動就汽勝
 網裝牌製河火及力煤車牌
 蠟麵牌膠磚化酒焦配煤氣爐
 疋布漆品燭粉烟牌瓦器精煤什
 絲油各文各精企舞陶破金電蓄
 種種煉龍瓷璃鋼光電
 印肥白火器器水電
 網墨品共自糖牌柴血血泥力池

資本：三千萬元

工業運輸
 礦業金融
 農林商業

經營業務

歡 迎 採 購



經濟部

中國植物油料廠貴陽

辦事處
廠

液體燃料

汽柴酒刹獅特
 油油精油機油

化學藥品

藥炭硫松凡各
 用酸酸節士種
 蘇油鈉油林類

日常用品

植國本光國
 火肥
 油皂

其他

名不
 目及
 繁多

貴州區一分廠一處一站

貞豐一馬壩坪一遵義一都勻一鎮遠一安順
 星縣一永興一興仁一牛場一青岩

電話 一處一846號
 一廠一528號

地址 一處一中山路267號
 一廠一南門外貴惠路11號

和成銀行

貴陽辦事處

經營商業銀行業務 辦理信託儲蓄存款

通匯地點

重	慶	上	海	昆	明	南	充	遂	寧	磁	器	口	資	中
衡	陽	瀘	縣	宜	賓	會	理	天	水	涼	涼	州	成	都
屯	溪	雅	安	西	昌	碧	口	長	沙	涪	涪	陵	化	橋
岷	縣	肅	州	臨	洮	蘭	州	閬	中	平	平	涼	龍	龍
沙	壩	魚	洞	康	定	合	川	樂	山	柳	柳	州	龍	橋

行址：省府路 電話：八五六 電報掛號：三四一

雲南興文銀行貴陽分行

業

務

經營存款、放款、匯兌、及其他法定銀行業務。

通匯地點

重慶、成都、宜賓、瀘縣、桂林、柳州、西安、西昌、昆明、箇舊、昭通、會澤、下關、佛海、麗江、祥雲、鎮南、永勝、玉溪、彌渡、永平、平彝、文山、羊街、及雲南省內其他各縣。

行

址

貴陽中華路一三六號

電報掛號：一七二八

電話號碼：四六八

金城銀行貴陽支行

經辦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地址：勇烈路二四號

電話：經理室七二七號
營業室七二八號

貴陽雲南益華銀行

營業概要：存款——利息優厚
放款——低利貸借
匯兌——迅速普遍
貼現——便利週轉

通匯地點：總行 昆明
分行 桂林 柳州 宜賓
成都 行陽 下關
重慶 昭通 麗江

資本總額國幣壹仟伍百萬元全數收足

地址 貴陽市正新路

貴州省

合作業務代理局

業務要目

- 代購生產原料工具
- 運銷合作組織產品
- 批發消費社必需品
- 辦理貨物存倉保險
- 供應市民日常用品
- 發行物價行市報單

地址：貴陽市中華路一四一號
電話：長途電掛號 四九六
報掛號 八〇一〇

貴陽廣東省銀行

辦理

匯款
存款
儲蓄
押匯

通匯地點

業務

地址：正新路
除廣東省內各市縣及重要鄉鎮皆可直接通匯外其餘
重慶、昆明、柳州、桂林、八步、鬱林、衡陽、長沙、梧州、長汀、贛州、龍南、筠門嶺等地均設有分支行處

電話：三五二一



半月論評

一切為了前線

重慶商務日報

蔣主席元旦日對全國軍民的播講詞和在中樞開國紀念會中對於文武百官的訓示，實為舉國上下所應一致奉行之民國卅三年度之抗建準則；這兩篇文告的對象和內容方面，雖然不盡相同，而精神上所給予我們的啓示，則前後實相貫注，并無二致。主席一則昭告全國軍民：今後「工作愈益艱苦，責任亦愈繁重」，「國家地位將愈增高，民族信譽也愈益加隆」，一則勸勉文武百官，對於過去「光榮的成就」，要「努力來發揚光大」，對於「國際地位的提高」要「以自立自強的精神來保持勿墜」。同時，主席在兩篇文告之中，更一再重申「軍事第一，勝利第一」，與「一切為了前線」之訓示，要大家「發揮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和傳統的精神」，澈底「實行新生活信條」，担當起「這個空前偉大的時代」中「艱鉅繁重的責任」，而「實現我們七年來一貫的信條：『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建設，使得一切行政設施，都能够以最少力量與時間來換取最大的收穫和效果，以配合軍事的進展和國際局勢的演變。第二：在民衆方面，首先要遵守動員法令，使得一切的社會動態，都呈現出嚴肅緊張的戰時氣氛，以適應前方的需求加強後方的生產。務求有錢者慷慨出錢，有力者踴躍出力，政令切合實際，執法絕不徇私，必如此，最後勝利的來臨，才能迅速到達。必如此，建國基礎的奠定，才能提早完成；同時，主席并指示了要從「提高行政效率」，「轉移社會風氣」，「加緊全國動員」三項着手，然後始能順利達成這兩大任務。

這裏，我們本諸一得之愚，願對主席的三項指示，根據事實，略陳管見，藉供國人之參考和當局採納。

第一：關於提高行政效率，主席曾經指出了四點，要今後行政工作能實事求是，聯繫合作，獎進人才，切實節約，這四點，確是肯中時弊，劃切詳明。我們知道誇浮散漫的官場惡習，到現在雖已泰半清除，而行政計劃的繁複與事務手續的紊亂，却無容諱言的在所難免；尤其是工作表現的不够緊張，上法下行的不够嚴肅，實為政令

推行之最大阻礙。今後究竟如何實施？主席的四點指示以提高行政效率？我們認為在計劃之前，首先應從考察實際情形着手，在執行任務期間，則必須以迅速確實為重。因為行政工作的目的是推行政府的法令，政府為了國家的尊嚴，對於任何法令的頒佈，當然不能不貫徹實施，然接受法令的民衆，在原則上是否有實際上的困難？在技術上是否有改良的要求？不但事先要妥為籌劃，即事後亦須力求改進，務使做到下情可以隨時上達的境地，然後才能使政令推行無阻，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其次，關於加緊全國動員和轉移社會風氣，主席曾經指出要澈底發揮人力物力，轉移散漫浪費跡象兩點。這裏，我們應該坦白的承認，抗戰雖然已經過了七個年頭，而後方的一切，却依舊不能與前線配合一致，尤其是奢靡誇浮之類風氣，因循苟且之事實，實有令人疑心此身不在戰時之慨。而造成此種現象的主因，可以說應由執法未能嚴峻來承其咎戾！我們應該認清今日中國的人民實是在世界上最優秀的善良百姓，七年來對於戰時的供獻，確已不為不多，可是這些人力物資是否都已涸滴歸公？自私自利，投機誤國的份子是否已經得到應受的懲罰？這些，對動員法令的執行與社會風氣的轉移，實具有莫大的關係。今後要掃清散漫浪費的跡象和發揮人力物力的效能，我們認為首先要從上層着手，官吏能廉，百姓自不敢不潔。如有玩忽，必須執法以繩！務使今日頹廢之風為之掃除罄盡，全國人力物力自得充分發揮。然後方能使得我們的行動悉合一切為了前線的訓示，而達成主席「今年定使戰爭轉移敵本土」的預期。（摘自一月四日商務日報）

有不為與有為

邵力子

我生平最佩服孟子的一句話：『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有不為，是說有些不應當做的一事情，儘管別的人都在做着，而這個人是絕對不做的；可以有為，是說有些應當做的事情，別的人都做不成功，而個人却是能够做成的。不應當做的當然是壞事，明明是壞事，何以竟有許多人在做呢？因為這些人都抵抗不住環境的誘惑和壓迫，起初瞞哄着自己的良心去做，等到做慣了以後，也就忘記那是壞事而安之若素了。祇有真正有志氣的人，決心十分堅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祇有認清楚那是壞事，就無論如何決定不做，這就是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道理。應當做的當然是好事，明明是好事情，何以又有許多人不去做，或者做不到底呢？因為這些人不是意志薄弱，便是利欲薰心，有的時候也未始不想做些好事，但一遇到什麼困苦和障礙，便躲閃着不敢向前，即使勉強去做，還是半途而廢，終於無成；也祇有真正有志氣的人，始終十分努力，鷄鳴而起，孳孳為義，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饑而不食，總能做出別人所不能做的事業，這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有不為與有為，都全憑一個志氣，更須認得清楚，一點也不肯苟且，『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有志之士非如此努力不可。

惡不能相容，正如螳螂不能同器，一個做壞事的人，斷然不會做出好事來，除非他徹底悔悟，立定決心，放下屠刀，才有成佛的希望。就是習於為善的人，如果中途把柄不住，偶然做出一件壞事，也可以立即墮落，前功盡棄，亞當夏娃的故事，正是說的這個道理，而基督教的信徒，一定要先信奉上帝，也正是為此。一個願對國家效忠的人，必先不違背國法有害國家利益的事；一個願對父母盡孝的人，必先不做敗壞家聲使父母痛心的事；一個願保持清白的人，必先不做一切奢侈淫佚的事；一個願建立功業的人，必先不做一切卑鄙苟且的事；這些道理都是十分明白的。拿破崙大帝的對倭抗戰來說，我們所以能希望最後勝利，就因為我們早已決定，決不接受敵寇的誘騙恫嚇，中途屈服求和。國民精神總動員會公布的國民公約十二條，從第一條『不違背三民主義』起，直到第十二條『不賣糧食和一切物品給敵人和漢奸』為止，全都是『有不為』的工夫。大家決心不做漢奸和順民，才可以戰勝敵人，復興中國。『有不為』，似乎不難，而實在很難，所以人人可以有為，而真正有為的人却總不多。最怕的是利害關係，許多人都把握不住，做漢奸的人由此，發國難財的人也是由此。孟子說得最透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得天下尚且不為，別的自然不用說了。

我們更進一步研究，應知『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這一原則，並不祇是適用於好事和壞事的對比。有兩種以上的好事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很想兼做，但苦於不能兼做，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就必須應用『有不為』的原則。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才力都是有限，尤其是時間上受限制，在同一時候要想做許多事，如果力量有所不及，結果必至於一件事也做不成。所以問是學做

的事，我們仍須審察每一件事的緩急輕重，有的可以後做，有的必須先做；有的祇好不做，有的量於那些一定要先做的事，然後不至於百舉俱廢。也不至於為了次要的事，反而把最重要的事延誤了。這一個道理，就整個社會講，更是重要；因為每一個社會的人力財力物力，在某一個時間裏，也都受着一定的限制；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整個社會都蒙其利，否則，整個社會都蒙其害。英美兩國的資力何等雄厚，但也必須把平時的許多生產事業停止下來，然後始能適應戰時的需要；蘇聯在三個五年經濟計畫，都有一定的步驟，在致力重工業的時期，輕工業祇能當作緩圖。作戰的國家，如果真想做『一切為着前方』，那後方一定有許多事情祇好不做，甚至正當的消費也必須嚴格限制。

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要自己反省，更要檢討整個社會的利害，不可祇覺得這件事是應當做的，就非做不可，而想到現在有許多事都應當做，我們的人力財力物力更是有有限，斷不能同時都做，顧此則失彼，後方的人吃得飽，前方的人一定吃得不够。妻會餓，有時並不是壞事，在聯絡情感和增進友誼方面是有好處的；但為了履行戰時生活，加強管制物價，蔣委員長在第三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曾提出一律取締禁止，而參政會也一致決議擁護。我們對於這一點似乎還未能徹底遵行，所以物價還是繼續波動。而在最近時期，食用品的價格更是上漲。孟子會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則舍生而取義』；這是講解『有不為與有為』最澈底的話。『求生』是人生的第一件應做的事，但與義相較，不可得兼，便應斷然捨去，生命尚且可捨，別的自然更不用說了。

（摘錄中國青年月刊）

從軍學生的歷史使命

重慶中央日報

「如大始燃，如泉始達」的學生從軍運動，不僅有其革命文化史的意義，同時還有其革命國防史的意義。就文化史的一面來考察，它顯然是「五四運動」後更進一步的文化運動。假如「五四運動」是文化史中思想解放及文藝復興的運動，那這一次學生從軍運動，就必然是文化史中思想純一化及文武合一化的運動。它將以思想純一化彌補思想解放後漫無歸宿的缺點，將以文武合一化糾正文藝復興中爭以「文章報國」而不知一洗文弱習慣的錯誤。這對於革命的文化史，自然有其應有的貢獻。再就國防史一方面來考察，它又顯然是「黃埔建軍」以後以全國規模而再起的建軍運動的高潮。它是把智識豐富，情感熱烈的活潑的生命滲入國防，藉以保證目前抗戰的必勝，和將來建國的必成。並且是以身作則推行平等義務兵役的行動。這一行動，不僅是「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兌現，同時還含有從國民心理上摧毀其封建舊傳統的偉大作用。因為，自北宋以來文武分途的結果，作為國防第一要素的軍隊的質，便漸次低降。這實在是一千年來，我們在國防上每遇侵略，無不大受損失的主因，而今在一般人觀念中屬於「文弱」一類的智識青年層，既能用行動表示其自身無逃避兵役的特權，則此後智識階級不服兵役的不合理觀念，定將一掃而空。我們的建軍自將以智識階級的踴躍參加而得到比目前更大的成就，就是建軍以

外的國防建設，也必因大量智識分子的滲入而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惟其如此，所以，這一次學生從軍運動在國防建設中也自有其歷史的意義。

蔣主席對於這一運動期待之殷，可於上月十日的訓話中窺見一斑。蔣主席切望從軍學生能成爲真正的現代軍人，並以三事相勉：第一，必須絕對的服從階級，嚴守紀律，奉行命令；第二，必須注重政治訓練；第三，應視軍營爲學校，堅苦操練，精勤學習。現在讓我們再在這裏略

事實昭示世人，沒有真正的現代軍人，不能組成真正的現代國防。我們今日正在世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時期。生產技術與戰鬥技術兩者皆有空前的進步。真正的現代軍隊和現代的國防，必須不斷的大量的有科學文化素養的青年滲入，纔可以迎此時代潮流而邁進。

不過，這是單從科學文化水準一方面來考察而下的結論，若另從軍人所需具備的條件來考察，我們必須明白，僅僅保有利用教育程度來表示的所謂較高文化水準，並不成其爲現代軍人。現代軍人所必備的條件，是普通較深的教育程度之外，還有豐富的軍事基本常識，更必須瞭解軍事組織的精神，有服從階級，嚴守紀律，奉行命令的良好習慣。就中尤以服從階級的紀律觀爲最重要。紀律是軍隊的生命，紀律不嚴，便不成其爲軍隊，不守紀律便不成其爲軍人。如果要使一個真正的現代軍人，便必須具備服從階級嚴守紀律的條件。對於這一點，我們希望從軍學生特別注意。我們固希望從軍學生特別重視服從階級這件事，但注意政治訓練認定實行三民主義是自己的

的天職，却也同樣重要。蔣主席說：「這是一個人，一個信仰堅定的人，正像莊子所形容的『始射一神人』，不論增添怎樣的變故，都不至因而動容，更無論於動心。如果我們內軍人都能這樣地堅定，那就不僅抗戰建國可提早實現，就是從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去促進世界性的和平建設，也必然能夠顯出其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量了。」

蔣主席，最爲從軍學生所不可忽的一點，就是要在自己的觀念中培植願做一無名英雄的觀念。國父有云：「華盛頓大名之下，不知包括多少無名的華盛頓，始克促成美國之獨立。」蔣主席本於此意，乃切切勸勉從軍學生：「今日之中國之青年，欲完成中國之革命，亦必人人以無名的英雄自居，人人立志作無名的蔣介石，一的確，歷史上一種驚天動地事業的成功，都靠無數無名英雄的努力。現在我們所從事抗戰建國，其局面的偉大，過程的艱苦，在歷史中既都沒有先例，則其需要更多的無名英雄，也是天然的法則。所謂天賦的法則，如更換一句話來說，那就是時代的要求。時代要求我們，國家的遺教，以個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拔之根基，並要求我們在蔣主席領導之下，以無名英雄的資格去一完成我神聖抗戰之使命，建設三民主義富強康樂的新中國，那我們之得在這偉大場中做無名英雄的一分子，就反而是無限的光榮了。」

總之，學生從軍，是剛明的一種運動，對於這一運動，蔣主席實寄以極殷切的期待：期待其能一轉移全國之風氣，樹立現代國民之新觀念，新精神，同時並期待其能在抗戰建國事業中發生一種決定的作用。我們現在無他語，但願從軍學生將來都能不負蔣主席的期待，都能完成其歷史的使命。

（原文載一月十二日重慶中央日報）

特載 中西文明之異同

吳鼎昌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五日在國立貴州大學演講詞一

張校長、諸位先生、諸位同學：

本人來貴校講話，這是第二次了——今天講個比較寬泛的問題，題目是：「中西文明之異同」。諸位聽到這個題目，也許要疑心我將博引兩方千百年之歷史，或兩方哲學家有關西方文明或東方文明之陳說，作對照比較之言論，我先聲明，我不作如此講法；我所要講的，是我在十幾年前讀中國舊書，發現中國人生哲學上有一個貫串理論，拿這個理論與西方比較有了一些心得。在北平時，曾和許多哲學家研究，不過這些意見，是我個人的觀點，還是不成熟的意見，今天就將這不成熟的意見，講給大家聽。

我們要知道中西文明之異同，必須先知道何謂人類文明？人類與礦物植物類不同，是不用說的，要說明的是「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幾希」，就是所謂人禽之分，就是所謂人類文明之所在。申言之，禽獸祇需要物質生活，人類非僅物質生活所可滿足，還有精神生活。人類是富有靈感的，禽獸沒有靈感，人類靈感，天生的感覺到人類不愛護人類，是無以生存繁殖的，人能愛人，獸不能愛獸，禽不能愛禽，故我認爲「愛人」這一點，就是人類文明之所在。愛人的程度高，文明就高，愛人的程度低，文明就低。自相殘殺之人類，就是野蠻種族，說不上文明，必自然歸於消滅。

但東方和西方愛人的觀點不同，西方是講博愛的，就是愛無等差，完全受耶教之支配，與佛教之普渡，墨子之兼愛相吻合。但佛墨在東方之支配力，遠不如耶穌，故博愛主義，遂成爲西方文明之結晶體。因爲博愛，所以個人之外，便是愛國家，愛社會，對於父母兄弟並無異於常人。例如：父母兄弟偶一之投館受餐，必須先得許可，或竟開送帳單；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爲他們愛人的觀點不同，他們這種觀點的歸趨，便形成公德重於私德。東方愛人的觀點，是「推愛」，完全受儒教之支配，推愛是由親及疏，由近及遠的。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以孝字爲起點，所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由這一點自然之愛推廣出來，因愛父母，推而愛兄弟，愛長上，愛朋友，故有所謂：「孝悌忠信」；因愛父母，推而愛妻子，故有所謂：「孝慈」；再推而至於愛國家，愛社會，故有所謂：「以孝治天下」之說；所謂中國之倫理，均完全由此孝字演繹出來。我過去不十分懂得「以孝治天下」，「孝爲百行之先」兩句話的解釋是何意義，經過多時思考才明白了。因爲孝是愛之始，愛人是要由愛自己的父母愛起的，不能愛親，其他之愛，便無法說起，其不能立身治國明矣！所以儒家更很明白斷定曰：「善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完全將愛人工夫着重在「推」字，這個觀點形成的哲學，便是仁學，施諸政治，便是仁政。仁字從二人，二人爲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愛人是由孝親做起，而推廣以

來的。單就理論講，自然是博愛主義好，不過這不是一律合人情，合事實的，由孝字推廣出來，是從人類本性發出，絲毫沒有飾，由愛自己的父母，推而愛人之父母，由愛自己的子女，推而愛人之子女，並且愛自己的父母子女，甚於愛人之父母子女，所謂「親親之殺」，這是十二分合於情理之學。我記得漢時有一位理學家，曾在他的書上記載過一段故事，大意是他本人幼喪父母，由兄嫂撫養成人，因此對兄嫂更加敬愛，愛他的姪子，亦過於愛他的兒子。有一次他姪子病了，他很着急，一夜之間，三往探視，不久他的兒子也病了，但沒有去看過一次。他自己記載上說：看姪子雖看了三次，但看過之後，便睡着了；兒子的病，雖未往視，而澈夜不能安枕，他自己以為工夫不學，實際這是一種自然天性，強勉不來的。因推愛關係，其流弊自不免私德重於公德。故在中國往往一個人，如果騙了親戚朋友，認爲十分不安，但騙國家的稅收，似乎無大關係。西洋人却以騙國家的錢爲莫大恥辱。西洋人有力者養有力者，無力者國家養；東方人是有力者養有力者，無力者有力者養。因西方愛人的觀點不同，其結果自不免差異。然中國舊日學說早經予以嚴密之防範，人自不廢耳！例如仁字，早以義字爲界說，故有大義滅親之訓，就是說有應該辦的大事，便不可啣啣爲仁了。春秋的石碏，爲了誅叛，殺了兒子，儒家許之，就是這個道理。「孝」字早以「忠」字爲界說，故有「事君不忠非孝也，臨陣無勇非孝也」之訓，（古書忠君之「君」字均可作「國」字或其長上解，不可拘泥）明明說以身報國爲孝字意義所許，仁以義爲重，孝以忠爲先，這是儒家推愛學說上最重要之點，後世人往往忽略，遂有私德重於公德之嫌，非儒家本意也。且孝字意義在孝經上有很明白之定義，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是明白說盡孝有三個階段，第一是孝於親，第二是忠於國，第三是服務於社會；這三段事不作完全，不算是盡了孝，不算是「愛人」，不算是文明國家的公民。博愛主義與推愛主義是中西文明不同之點，推愛之極，即是博愛，儒家學說是很完整的，我們祇要實行孝經所揭出的孝於親，忠於國，服務於社會三段落指示，便不愧爲現代化之公民，諸同學讀中國古書，須知道我們的古書中都是研究人與人的學問，根本要義在愛人，由孝字做起，而以忠字爲界說，演繹爲仁學仁政，而以義字爲界說，就可以把中國哲學貫串起來講了。中國仁學，不獨於立身報國，有很明白之貫串道理，就是對人對事，也是「推愛」意義所能貫串的。譬如對人也由推愛演繹爲忠恕二字，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如：「所惡於上，無以復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無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可以說對人之意義盡於此矣。譬如對事，由推愛引伸出來一敬字，所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可以說是對事之意義盡於此矣。儒家的人生哲學是無所不包的，就是沒有人指出一個貫串的道理，讀起來便少頭緒，我這未成熟的意見，也許對於各位有多少幫助。我們如能推孝親之愛及於全人類，那麼世界上便不會再有戰爭，所謂「大同」一烏托邦之理想，也就是如此。我們要把愛人的大道理，推之於國際，使每一國的人民，都浸潤於愛之溫流中，使大家不想殺伐，然後這個推愛之「推」字才算到了至極，「推愛」之極，實也包括了「博愛」的道理在內。去歲十一月中國羅德黑蘭四國領袖會議，及最近美總統羅斯福咨國會文中，均一致研討如何使人類生活提高之道，過去戰爭，恆斤斤於賠款爭地，此次則着意於戰禍之永遠消除，經濟基礎之穩定，及人民生活之改善，這實在是在愛人的崇高表示，今天講中西文明的差別，是希望能幫助諸位青年讀中外書籍於融匯貫通上得若干參考以闡發愛人的道理。



憲政與政治思想

張知本

「生於其心，皆於其政；發於其政，皆於其事」；是見人類之行動，都淵源於一種思想，尤其是一種政治行動，更必淵源於一種政治思想；政治行動是形態，政治思想是靈魂。例如憲政，就是一種政治形態，憲政的發動，一定寓有一種政治思想，如果沒有政治思想的憲政，那就是徒有形態而無靈魂。有靈魂的憲政，那才能够收到好的效果。

欲明憲政

與政治思想之關係，首須說明政治思想之產生。關於此點，學者間之解說頗不一致，有以政治思想純係某種之政治或政論家產生之理論者；有以政治思想由於感受前代環境及政治經驗之遺留企圖改善或充實而產生者；有以政治思想由於感於時代環境及種種不同形態的政治上表現之激發而產生者，請說各有所本；主張政治思想純係某一政治家或某一政治理論家個人之性情之表現者，以管子個性近於切實注重功令主張「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商君號為刻薄寡恩主張嚴刑峻法，盧騷憤世嫉俗抨擊專制而倡民約之論，福祿特爾光明俊偉不喜拘束而倡自由之說。主張政治思想純係理想主義之政治家或政論家產生之理論者，以王荆公未察實際遽行青苗法，柏拉圖憑空構造著「共和國」以

發揮其政治理論，多瑪氏摩爾藉「烏託邦」而寄託其大同理想。主張政治思想由於感受前代環境及政治經驗之遺留企圖改善或充實而產生者，以蕭何病秦苛政而約法三章，樂法治之弊而取其長，孟德斯鳩潛心羅馬盛衰之理並各國制度法典而成法意一書。主張政治思想由於感受時代環境及種種不同形態的政治上表現之激發而產生者，以春秋戰國之紛擾，「法治」有時失其效用，尹文子遂倡「法不足以治則用術」之「術治」論，慎子亦主兼採用「勢治」之說，近代則墨索里尼為獨裁政治思想及體制之倡導。

雖然吾人

若細加推敲，政治思想之構成，固非如是之簡單，其必於上述四要素中綜合而成或至少於上述四要素中佔其一二。管子相齊一匡天下，何莫非受當時國際形勢之影響，始毅然主張法治。孔子謂「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一語，足證當時環境不易應付，商君專秦併六國而開統一之局者，亦莫不由於現實迫之而不得不斷然變法革新。盧騷願蘇特爾二氏，正傾軋於十四死後，君主專制政體弊端暴露之際，英國文化，日衰流入，於是國民思想漸起，二氏復倡導於先，遂繼為當時之先知先覺。夷考其故，又何莫非因前代與時代環境之激發而致，且盧騷之民約說完全脫胎於一五七七年姚伯蘭基氏之征討暴君論（為君民

其後諸布思洛克等皆謂此言，虛懸不過其大成耳。故政治思想純係其一代政治家或政治理論家個人性情表現之說，殊未確然。王利公爲一代政治實行家，背苗諸法，雖未著若何成效，亦格於當時實際政治上之人事與行政，在理論本身與行政目的并無可議。且其遺緒規範，足資景慕，近人以之與張江陵會文正等並稱爲中國過去之大政治家者，良有所以。至柏拉圖與摩爾二氏亦因政治環境之刺激而發，非徒託空言可比。陶淵明之桃花源記，外形上雖似一篇散文文學，而實際上與柏氏之共和國摩爾氏之烏託邦之受環境打擊寄政治理想於文學者有同一之作用。故政治思想純係理想主義政治家或政治理論家產生之理者，又未盡然。蕭何約法三章，不過師前人之法治精神，孟德斯鳩法意，亦係參酌各國典制而集其大成，然二氏之個性或不近於法治，或不生於當時變遷之秋，其政治思想或與法治相反亦未可知，故政治思想純由感覺前代環境及政治經驗之遺留企圖改善或充實而產生者，亦未盡然。伊文子主張「術治」，慎子偏重「勢治」，墨索里尼創設獨裁政治，諸如是類思想之形成，固多由於時代環境之所致，然平日政治理論上之修養與研究，個人性情之不同，亦有莫大影響，故政治思想純由於感受時代環境及種種不同形態的政治上表現者，豈難而產生者，更未盡然。

總之政治

思想不僅爲個人性情之表現，亦非僅爲純理論所產生，且非僅爲前代環境之遺留，又非僅爲時代環境之產物，概言之，政治思想乃上述四個要素所聚積而結合之化合物。例如馬基維利於意大利內憂外患蘆至之時毅然於其所著新術政治一書中我國有譯本多種，商務本譯爲「霸術」，日人多譯爲「君道」，主張一而以法律解決內外爭端，一而以暴力爲後援，政體則以絕對專制爲必要，似乎馬氏之理論，純爲客觀環境所要求，而其實馬氏之思想，受於亞里斯多德氏之專制政治說之影響最大。降至近代，墨索里尼則創獨裁形體之政治者，亦不過胎於馬氏之思想，故法西斯並無若何高深之理論。除上述四要素外，政治思想尚有採用科學方法以成體系者，當十九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發達至極時代，政治思想即採用自然科學方法以爲論斷，例如馬克斯社會主義中所包含之政治思想，約翰密爾，斯賓塞之政治思想以及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所包含之政治思想，尤其如 總理所倡導之三民主義之思想，大都以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爲根據。不特此也，政治思想常受當時流行的標語之

影響或影響於當時之標語，例如十七至十九世紀中葉所流行之「自由」「平等」「博愛」諸標語影響於康德之個人人格尊嚴論，美國之「民享」「民有」「民治」之標語，對於近代之德謨克拉西所給予之影響亦不少。是故政治思想爲一多方面源流與要素集合而成之哲學體系，非由於某一個人或一件事或一個環境所可產生者。

吾人既已

明瞭政治思想之源流，今再進一步試將中西政治思想作一概括的敘述，則對於憲政與政治思想之關係更易解釋，我國政治思想雖勃於戰國時代，因當時封建制度崩潰，貴族政治政體，言論比較自由，於是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相繼而起，猶之歐洲希臘羅馬時代，成爲後世思想之濫觴。併六國，坑儒焚書，思想受一大打擊，漢魏兩朝，思想似統於一轡。然思之爲物，非權力所能遏制，故論我國政治思想，仍顯精神繁榮，鼓述不輟，若歸納言之，大別爲三：自然法思想，民本思想，法治思想。自然法思想與天治主義似同而實異，天治主義即將所有萬物萬事歸結於神，以神爲最高主宰，此與歐洲古代之神權論相似，自然法則以宇宙間有自然之法存在而爲人類所當遵循，前者將神人格化，而後者將神抽象化。自然法思想發現於先秦諸子者，如孔子云：「天垂象聖人則之」；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墨子云：「立天地以爲儀式」者是。自然法以爲人類所必須遵循，故其思想中又可分爲二類：一即大同主義思想，禮運大同篇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可代表之，「公」者，遵照宇宙自然法則而得之結果。一即社會主義思想，儒家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爲代表，「平」者，天下皆得公平之謂，此亦遵照宇宙自然法則而得之結果，故自然法中孕育兩大崇高思想。至民本思想，見於先哲言論及典籍所載，更俟詳數，如書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云：「民爲邦本」，以及孟子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均以民本主義爲其思想中心。法治思想，起源於戰國中葉，至宋葉，韓非始本於道家之人生觀，參用儒墨兩家正名實之旨，發揮成爲嚴整而有系統之學說。秦始皇用法家之政策，完成統一大業，漢治秦代之成規加以改善，得有四百年秩序之發達，故法治思想在中國政治思想上頗有注意之價值。此外以法治爲主兼採「術治」或「勢治」之思想者，則有尹文子與慎子二人，尹文子所謂「術者，人君之所常用，羣下不可妄窺」。與馬基維利主張人君用術，不可使臣民窺破

一點，直不謀而合，所謂「勢」者，即是「權力」，「勢治」即是專憑權力以運用政治，法家只承認「勢」為「法」之後盾，而極端勢治主義者，則以法治為贅疣而不用一顧。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國政治思想的大概。

至歐西之

政治思想，於產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以前者，如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邊沁，密爾敦，洛布思，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氏之說，思想與中國之自然法思想，民本思想，法治思想，在理論上無甚出入，惟在運用上稍有不同。自法國大革命以後，世界上多數之社會與政治組織均有根本變化，產業革命，則使各種經濟組織根本變化，政治變化以後，盧梭之民約論頗為政治思想之中心，產業革命以後，亞當斯密之國富論亦勃然而興。這個時期，為個人主義盛行時代，主張政府干涉個人活動愈少，個人才有幸福，於是在政治上確立了個人主義的德謨克拉西。在經濟上盛行自由放任主義，但是放任主義偏甚則社會上貧賤階級愈多，於是歐文等主張排斥個人主義及自由放任主義，以改善無產者的生活環境，因之又引起馬克斯派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思想；政治上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主張計劃經濟，限制個人的經濟活動，由於此種思想之鼓動和刺激，又產生與此極端相反之獨立政治思想——政治上主張集權，經濟上主張統制——而形成近代之變型政治。因是，在近代政治思想中歐美各國共有三種不同之表現：一即由盧梭思想而發生之法國革命所遺留下來的民主政治或議會政治，英美法以及瑞士諸國屬之。一即由馬克斯思想而發生之俄十月革命所改變之普羅階級專政型民主政治。一即由法西斯思想與納粹思想而產生之集權政治。

無論古今

中外之政治思想之派別如何複雜差異，歸納起來，大概不外以下數種範圍，即：大同主義，社會主義，民主主義，專制主義等；其所表現於實際政治上者，亦不出：君治，民治，法治，勢治，黨治等型態。但是，此數種型態，亦頗難劃分十分明晰，何則？蓋有些國家多採兩個或兩個以上方式者，例如英國雖為君主國家，而又採議會政治；訂立憲法，是兼民治，法治與君治於一爐之政治型。德意兩國似為勢治與黨治之國家，但其中中心仍在兼採法治；諸如是例，頗使政治學有不易區分。愚意以為如將各種政治思想與實際政治型態加以分析歸納，則僅有兩大類別：一為人治，一為法治；暨君治，勢治，術治與一都

分之民治皆可列入人治方面，而民治與一部分之君治以及兼採法治之勢治或術治者，亦可列入法治方面，如此種分類尚合邏輯，則政治思想亦即不出此人治與法治之範疇，而憲政與政治思想之關係，在解說上，亦自較易。

所謂人治

亦含有二種不同之概念，一為人治制度之「人」，須為一種「仁人」或「哲人」，即儒家所謂「惟仁者能在高位」之「人」，亞里斯多德所謂「哲人之王」之「人」。此種概念演成之結果為「哲人政治」，為「哲人政府」。另一種概念則以「人治」應為「能人」，一國之政治領導者，須具有經天緯地之才能，至其個人之性格善與良否，並非必需之條件，此種概念演成之結果，為英斷果敢之政治，然大半多走入「暴力專政」，「霸道政治」之途，「人治」之內容，略如上述，惟無論如何，其結果必致「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得人則昌，失人則亡」，在政治上絕不能樹立百年基礎。「人治」之弊，既多於利，以是主張「法治」者多以「抱法則治，背法則亂，背法而待弊，弊至而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而待弊，弊至而治，是千世治而一亂也」(韓非難勢篇)為理由，而抨擊「人治」。兩種思想中，「法治」之優點，即在使政治能建立良好規模制度，有軌道可循，雖繼承者為中材之士，亦不致有阻礙之虞，非若「人治」須待偶然之機會，出一非常傑出之人才而後始能「治」，一部人類歷史，即為此兩種思想所範圍，隨其消長而變化，時而偏重人治，時而專重法治，時而二者極端衝突，時而二者互相調和，各種政治形態遂亦依而循環變化，簡言之，歐洲在一六八九年大革命以前，多重人治，自後以至近代則多重法治，惟德意兩國變型政治產生後，似乎又在回復至「人治」之途，至如蘇俄以國事多取決史達林一身，美國因羅斯福之才能致不拘憲法成規而連續選至二次以上，則又似近乎「人治」與「法治」之調和。據吾人之經驗，嚴正而言，「法治」易流於呆板，沈滯，遲延，錯誤，立憲之機會，常至牽制以及機械主義等弊，而「人治」則易流入專制或視察不週，處斷疎漏，固執成見等弊，不過兩相比較，法治果能徹底實施，政府與人民均有運用法律之能力，恪守無違，則上述諸弊亦可避免，自較「人治」之弊為少，惟二者是否需要調和之處，以及目前各國政制是否有得失之處，非在本文範圍之內，姑不具論。

政治思想

影響及於憲政者，在吾國可推周禮。所謂「懸法象魏，使民讀之」，即近人之憲法，而周禮本身亦頗具成文憲法之形式，歐洲則以亞里斯多德為政治思想家中闡明憲政之鼻祖，亞氏分國家與法律為二類，一為規定國家機關組織及其權限之法律，一即根據前項法律以規定各項設施施行前項法律之手續並防止前項法律之被侵犯。此項分類，即近代組織法與行政法，惟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與參政權之根本原則未及列入，故亞氏之分類僅可稱為一部分之憲法形式，給後人以憲法之啓示而已。至十四世紀時，法國分國家大法為「王法」與「國法」兩大類，「國法」即根本法，國王不能自行變更或廢止法律，如欲廢止或變更時，國王必須取得當時等級會議之同意。所謂「國法」者與近代之憲法更相類似，如其國王廢止法律之手續，亦與近代憲法所規定之議會或相似之組織吻合。此種政治思想對憲政影響之初期，其重要點偏重於憲法形式之創制，及至一五二五年英國之大憲章公佈，而憲政之思想遂更發揚。考英國一五二五大憲章，其重要性不在於其所具載之條文影響於後世之憲法實質如何，而在其所包含影響於後世政治思想以及憲政之兩大原則。所謂兩大原則者，即：第一、無論若何國家，須有若干法律以為政治制度與組織之基礎，是謂法律，須為國王或現政府所必絕對服從；第二、如現政府拒絕服從此類法律，則國民有施行強制之權，即因之而顛覆政府亦所不惜，凡關於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皆由法院竭力保護。此兩大原則所代表之政治思想復可分為三項：即民主思想、權利思想與自由思想，國王與政府須一致服從國家之根本法，而此根本法又為人民議決者，其影響及於當時與後世者，自然無疑為民主政治。人民與君主間權利競爭之不已，而確定兩方面之權利加以保障者，厥恃法律，一憲章中許人民有權施行壓力迫使政府服從法律，當係權利思想以為主動，近代各國人民之爭立法權及其他民權者，亦頗受此影響。至於人民各種自由權，在當時極端君主政治時代，而為人民所爭得，誠屬奇蹟，且此類自由權為普通法院判決，而普通法在英國法律系統內又具有悠久歷史，則其所加之保障較近代各國之成文憲法，更為鞏固。除此三項思想外，總匯其流而促成大憲章之頒布者，為法治思想，蓋大憲章之產生為當時英國君民爭權之結果，君主所以轄其人民者，厥為「人治」，而人民得運用根本法與議會以控制國王及其行政機關者，厥恃「法治」，故大憲章之產生，即「人治」與「法治」

「思想鬥爭之結果，亦即「法治」思想之勝利，更足證明「法治」與「君政」為不可分性。

降至十六

十七兩世紀之時，宗教革命興起，馬丁路德加爾文等主張信教自由，抨擊舊日宗教束縛意志，敗壞性靈，干涉政治之非是，一唱百和，尼德蘭、法蘭西、英吉利以及德意志等國均樹反教人旗幟，各國王室遂相繼承認人民有自由選擇宗教與信仰自由之權，舊教之威權，至此掃地以盡。但宗教革命之發生，雖由於科學昌明，智識發達，與夫人類理性之進步，而實際上含有政治意味甚重，蓋其中心即在排除宗教對政治之干涉以及力爭天賦人類之自由權，而其結果亦影響憲法之內容不少，至今各國憲法猶以宗教信仰自由為最於條文之中。其次，教會之教約對後日之憲法觀念之形成，亦具有莫大之影響。如英國一六四二年革命時克林威爾所擬之人民公約，美國康奈爾卡特之根本法是。與宗教革命前後產生者，又有君權與民權，專制與民主之爭，持君權之說者，即主張勢治之馬其維利，彼以「君權無限，人民有絕對服從之義務，無辯論法令是非之餘地」；英王詹姆士第一曰：「君主可自由立法，毋須得國會同意」；法王路易十四曰：「人民不能有限制君權之事」；與此極端相反而引也日後美法之革命者，當推盧騷，孟德斯諸人。盧氏著「民約論」一書，略以「人類自由結合之社會，應以人類之公共意志為基礎，全體福利為目的，故人民對政府，須有監督之權」。孟氏則就實際政體多所說明，以行政、立法、司法三者必須鼎立，互相牽制互相監督，而後人民之自由，始得保證。二氏之言既出，全法人民始知君權思想之非僅不可恃，並且了解自由之真諦，而北美之抗英獨立，實為二氏之思想有以促成。一七七六年，北美抗英獨立後，即施行憲政，憲法所規定之言論自由，信教自由，身體自由，出版自由以及全民平等悉與盧氏之思想適合，三權憲法之訂立，亦以孟氏三權鼎立為依歸，政治思想之影響於憲政者，以此例更為顯著。「人治」與「法治」之趨勢如何，此次革命結果，更足證明。

吾人現在

略述英國之憲政，自大憲章公佈至查理第一時，政治復趨舊日之腐敗，暴戾苛刻，專制至極，所有一切法律俱視同具文，議員克林威爾還振臂高呼，提倡恢復民權，并反抗查理第一之苛稅，且團結會議，要求君主徵稅必須議會同意，卒於一六四九

年查理第一被處決，英國遂由君主專制而轉為君主立憲。此種政治思想，即「法治」與「人治」之爭，其結果為「法治」之勝利，而「人治」之失敗。此種政治思想，即「法治」與「人治」之爭，其結果為「法治」之勝利，而「人治」之失敗。此種政治思想，即「法治」與「人治」之爭，其結果為「法治」之勝利，而「人治」之失敗。

憲政與政治思想：四

年，莫查理斯之育於市朝，市民權政體於英倫，而一六九九年之權利宣言亦由斯頒佈，成爲英國憲政史上最重要之一頁，考克林威爾之所以能推翻皇室，重建君主立憲政體者，受於米爾敦之政治思想頗多，米氏與洪布思想以「自然法」「合理的自由」「君民契約說」(見前)爲其思想基礎，及後潘氏不主張推翻皇室，夫而之法，遂由米氏擁護克林威爾革命，故英國權利請願書，由於君民契約說而產生，是政治思想對於憲政又一例證。

英國革命

反對查理斯第一之各種苛稅與政治上及宗教上之壓迫而起，美國之革命，純由於清教徒抵抗英王喬治第三之苛捐雜稅，法國之大革命，則被壓迫之人民，不獨革路易十六一人之命，並起而革貴族及僧侶之命，故法國大革命之戰爭費時最久，其間變易團體者三，更見憲法者凡十一次。此十種憲法爲：(一)一七九一年九月憲法，(二)一七九三年六月憲法，(三)一七九五年八月憲法，(四)一七九九年十二月憲法，(五)一八〇四年五月憲法，(六)一八一〇年六月憲法，(七)一八三〇年八月憲法，(八)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憲法，(九)一八五二年十一月憲法，(十)一八七〇年五月憲法，(十一)一八七〇年九月憲法。

經過十一

次之更改變易，直至一八七五年始由保皇黨共和黨雙方妥協而產生一部憲法，成爲今日法國憲政精華之所寄，關於一國之所以改變十數次而始始成立一部憲法者，學者多以由於當時法國人民在政治上而經驗累積之所致，愚則以爲此十數次之更易，多由於政治思想所轉移，蓋法人感覺銳敏活潑好動，故盧孟諸氏之說一起，革命即因之而起，草憲法者亦遂以符合盧孟諸氏之說爲其目的，而僅作理論上之探討，忽略事實上之考察，及其發現不合現時環境時，乃又更易，廢時廢日，莫過於此，其實，盧孟二氏雖以民權自由平等爲思想之中心，然關於立法方面，仍以顧及歷史背景及其他環境爲要件，孟氏於其法律精義中會闡述至詳，其言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治旨趣爲主，不啻惟是，又當適於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於其國之廣狹及與隣邦相接之位置乃至土壤之肥瘠……；又當適於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國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向與其性質」，簡言之，一國之根本大法與普通法律，除須符合由政治思想而變化之立國精神或主權外，尤須注意民族之歷史背景，地理環境，民族心理與夫生活

條件，非僅以符合當時政治思想爲目的，否則則足適履，鮮有能完全運用於實際上者，當時法國憲政情形以及憲法之屢易者，或即在此，且思想學說爲活動的，而典章制度爲固定的，思想學說爲靈魂，典章制度無異軀體，有軀體而無靈魂，固使軀體失其中心，然過於重視靈魂而忽略其軀體，則此靈魂亦不過爲空虛渺茫高尚幽遠之精神而無所寄託以顯其偉大。是故立法者須能使軀體精能隨俗，能洽於實際運用，而靈魂則不妨有其高尚而使其主宰一切，且典章制度多爲百年大計，既不可專驚空泛，亦不可過於離開思想，法國革命時代，十種憲法之變易與一八七五年之憲法之成立，堪爲吾人借鑑。是政治思想與憲政關係之微妙，又爲一顯著之例證。

總上所述

本文內容可分四部：一、人類之政治思想，不論其派別如何複雜，紛歧，歸納起來，不外「人治」與「法治」兩範疇；二、憲政之消長常隨「人治」或「法治」之思想而消長，本約「人治」全盛時代，憲政之被重視者甚渺，「法治」和憲政則爲一正比例；三、近代憲政觀念產生多源於中世紀英國之民主政治思想，十六七兩世紀以來美法兩國革命時代之民權主義思想以及自由主義思想；四、政治思想而影響憲政，但在憲政實際運用上可不必刻板式反映着政治思想，在事實環境之下，憲政之實施與憲法之頒訂尚須顧及種種現實。除此以外，吾人尙須注意者，即由某一新的政治思想而產生之新的憲政制度或其他政治制度而擬付諸實施時，則吾人於探討此新制度之得失，必須先將該項制度所由產生之政治思想和理論加以澈底地地和地地探討，而不能支離破碎或分爲制度自制度思想自思想兩部去研究。例如，吾人研究「總理之五權憲法時，必先將三民主義以及「總理其他思想說整個的加以研究，而探求「總理主張五權制度之所由，然後再和三權制度下之總統制及內閣加以比較研究，在理論與事實之下，吾人即可看出總統制之弊，在於立法與行政牽制過甚，組織過於剛性，平時不能聯絡密切，亂時尤不能應付非常，美國羅斯福總統常受各方阻礙與打擊者，即總統制所給予之弊。內閣制則因解散權之運用，議會無形對內閣屈服而造成內閣獨攬大權之局面，官僚政治因而而生。至五權制度，則適合於我民族性格且不停於歷史背景，具有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長而無其短；國民大會，則代表人民行使政權，政府五院則行使治權，整個組織皆集中於治權與政權上的運用，簡單敏捷，呼應靈活，而又兼民主與集權之長，(以下轉第八八頁)



對於戰後應具的認識

陶孟和

戰爭只是一種

手段，它所能達到的只是打倒敵人，或推翻敵人的政權，戰爭所能解決的只是一端，非用戰爭無法解決的一端，而它却帶來了需要解決的問題無數。特別是現代的全面戰爭。這次的全球戰爭，它的影響所及可謂無微不至，無遠非屆，它所賜予的問題當然更繁多，更複雜，更困難。所以各盟國裏有許多人士，官吏，專家，學者們現在正為戰後改造，戰後不可勝數的個別問題，絞腦筋，嘔心血的思索，研究，討論，計劃，以備日後採用。最近報告，美國一國便有一百三十個以上的公私機關從事於這個重大的工作。

應付戰後必須

具備一定的認識，凡是處置一件事，處置者必須抱有一定的精神，懷着一定的心理態度，這個精神或態度影響所得到的結果，應付的心理有時還未必果能得到所希望的，假使不幸認識陷於錯誤，當然更不能希望有所成就。因此，我們要應付戰後種種，必須具備健全的，正確的，切於實際的認識。

第一我們對於

戰後絕不可僅存恢復原狀的觀念。變化是人事的常象，何況經過這次長期全球戰爭，維持原狀在法上雖然是有用的詞句，但在事實上幾乎是不可能的。誠然，我們失地一定要恢復的，但所恢復的，決不是故土原來的景象，而在恢復以後我們不會，也不應該安於原狀。還必須努力去發達它，繁榮它。我們的國家已經不是原狀，僅就國際關係一方面說，我們自己所承認的，也是各國所希望的，今後要積極參加各項國際行動，有效的協同解決各項國際問題，盡力合作的維持世界的秩序與和平。我們的社會也已經失去現狀，而我們也並不希望原狀的恢復。現在還有不少的人懷想過去的偶然的好年月，

憧憬一個已逝去的時代裏通商口岸的恬嬉的生活，渴望再回到戰前的狀況。在持久的戰爭時期，追想和平時代，雖然是大風雨前夕苟安的和平的景象，是可以諒解的；但是恢復原狀的希望却是一個可憐的，不智的幻想。

不特不應僅希

望恢復原狀，還要積極的爭取主動，無論對內政，對外交，不單要迎頭趕上，還須趕上前去。即如將來編遣軍隊問題，聽說有人主張此事在中國不成問題，因為我們的武裝同跑大都來自民間，一旦戰事告終，他們便可以歸農。這實在是在再危險不過的看法。戰爭結束並不就是安甯，並不是家給人足。戰爭所遺留的是什麼，是破壞，是毀滅，到處是荒蕪的田園，破爛的城市，離散破碎的家庭，停滯衰頹的產業，億萬的殘廢無告的以及受辱踐踏的同胞，如何安頓，何處是他們安身立業的處所，這些都不能自動的恢復的，都要我們有計畫的努力去安頓，整理或救濟，即在大後方，雖說完整，但因戰事，特別是在戰事告終以後，也不能避免普遍的解紐，一般的牽動，凡此均須事先準備周密安排的計畫。上次大戰以後，各國未能預為之計，遂致釀成產業的衰頹，金融的崩潰，全世界空前的不景氣，每個國家的失業者以百萬計，正是一個最明顯的教訓。美國有鑑於這個教訓，所以他們的政府，產業界，教育界人士都正在籌畫如何訓練戰士恢復和平的生活，如何調整戰時產業應為和平的生產，如何使戰爭國家轉變以應付和平時代的新局面。總之，放任，無為而治，已屬過去，自動的調整，自然的重建，在現代為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時不我待。所以必須政府與人民通力合作，根據專家慎重，精密的，有遠見的籌畫，才勉強可以應付戰後的局面。還有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三民主義。我們必須努力促進它的實現，才可以上副中山先生

對於戰後應具的認識：一

的遺志，下足以對得起幾百萬浴血抗敵的勇士以及六七年顛流離的全國民衆。而要促進這個崇高的理想的實現，更需要積極的主動的籌畫，與全國人民長期的堅苦卓絕的努力。

在國際上我們

也應該採取積極的主動的態度。二十餘年來，軸心周章，演成今日的全球大戰，又是一個明顯的教訓。我們在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方面誠然是一個後起國家，但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地位。我們人口與疆土固然佔世界的主要部分，尤其主要的，我們具有一種義之邦的傳統，我們又有中山先生世界和平的理想。我們內政修明整齊，對外的主張與行動正大光明，即可在國際上構成一個偉大的道德力量。在國際社會裏與在普通社會裏一樣，道德力量永遠可以站得穩的。自立即所以立人，自重即所以勉人，同聲相應，必不乏和平主義的友邦的擁護。

最後我們要認

識時代，要認識時代的精神。我們是世界上最長而又會產生燦爛文化的國家，但我們因此吃虧，受了歷史的壓迫。我們永遠是一個向後看的民族，言必引古聖先賢，行必稱忠臣良將，這是我們的一個不幸。因此我們便喪失了創造與進步的精神。人類歷史不是循環的，乃是前進的。一個民族的處境與一個人的處境一樣，不會在兩個時間相同的。過去的歷史只可以告訴我們幾千年如何合演變成今日的社會，今日的世界，還可以告訴我們古人的錯誤在那裏，以免再蹈覆轍。它不能告訴我們如何應付現在。在二十世紀裏——注意：在二十世紀裏——希特勒夢想成就超過查爾大帝，拿破崙的事業，墨索里尼夢想扮演凱撒，日本的軍閥夢想重演成吉思汗的偉績與英國在過去兩世紀裏所經營的帝國建設，雖然他們所用的是現代的工具，都是因爲不認識時代，而作出逆時代愚蠢行動。幾世紀以來科學的發見與發明已經澈底的改造了世界的情勢，成爲「天下第一家」。幾世紀以來在各國民族，民權，民生制度的發展，已經使世界大部分的人民不得不保護他們的累代辛苦得到的寶貴的遺產而努力，雖戰爭也所不惜的抵抗這個逆時代的納粹法西斯主義的統治。

所以我們今後

對於人類社會的演變必須向前看，而不可被過去情況完全不同的歷史所拖住。例如在今後世界裏，自己生存同時還必須容讓別國生存，自己發展同時不能阻止別國發展。沒有

一個國家能够單獨抵禦外侮，這個在這次戰爭已充分證明了。各國只能在國際秩序裏求到獨立與自主，只能在世界和平裏求到安全與保障，過去國稅關係的格式，孤立，遠交近攻，縱橫捭闔一類的把戲已經都不能適用在這個嶄新的局面。

人類社會既然是前進的，我們今後應付國內外萬千日新月異的新處境，便不能從歷史事實裏求解決。遇到每一新的處境，我們所需要的是審察情形認識時代演化的趨勢，利用勝後的各種專家的知識，而運用自己的智慧與創造的，不是因襲的，傳統的，傳統的思考，以決定應付的方策。

(原文載桂林大公報)

(以上接第八六頁)爲實施三民主義一最完備之制度。如此反覆探討，再思事實環境量衡，擇其可先後緩急者而酌量增損更易，以求總理之政治思想得於五權憲法中實施，而實際上憲政又不悖於總理之政治思想，則三民主義之實行，五權憲法之頒布，又豈同法國大革命時代之憲政，必待前後八十餘年更稿十一次始正式實施而奠其基礎哉。

時賢主張

憲政，而其政治思想，則不盡同。但不少以外來移植之思想，爲努力之方向。比之三民主義，爲國父四十餘年經驗之積累而成，相應時代潮流，合乎中國需要者，則有霄壤之別；「兼之毫厘，謬以千里」，謀國是者，應於此多加注意，不存個人成見，不挾褊狹思想，則憲政前途，其庶有焉！

甲申元旦試筆

前錄

甲子一周昨夜滿。不辭艱苦度餘年。
民勞未許征條籍。歲歉難將賦課蠲。
舉國興亡爭此日。匹夫責任屬當前。
朝書春帖神來筆。喜把鐃歌換凱旋。



世界永久和平與中國經濟建設

蕭 鐸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二十年，工業發達的速度，超過了從前一二世紀的成就。大機器工業的生產，尤其是交通工業和軍需工業的突飛猛進，所需資源數量的龐大和種類的繁多，都不是一個小地域內所能供給。工業便是國力，為着膨脹工業以擴大國力，日本和德國便不擇手段地想掠奪世界資源；日本首先侵略我們的東四省，德國便從捷克下手。故第二次世界大戰，雖象徵着一種思想的衝突，而其實是侵略國掠奪資源的問題。所以在世界的論壇上，一些討論戰後世界永久和平問題的人士，提出了「資源再分配」的主張。

依照工業發展的情形

而論：戰後小國家民，實是難於存立。凡是沒有大量的原料，珍貴的礦產如錳，錫、鉍、銻等金屬，和非金屬的煤、汽油之類，便建立不起重工業；沒有重工業，便沒有重武器，等於撤除了國防。所以經濟國家主義如果還是繼續存在，則今後世界各國仍然要為資源的取得而發生爭執。要保障世界和平，便不能不先解決怎樣分配資源問題。

戰後世界資源的劃分

現在已有個大概的輪廓：第一，是以美國為主要國家的新大陸，地理廣闊，蘊藏豐富；第二，是以英國為主要國家的海洋島嶼與澳洲非大陸，地

世界永久和平與中國經濟建設：一

位偏要：資源衆多；第三，是以蘇聯為主要國家的東部歐洲和西部亞洲，地域遼闊，蘊藏富厚；第四，便是中國，位於東南亞洲大陸，地廣人衆，潛力雄厚，足以建立嶄新的大工業。這四大區分，各包括有多數的人口與大量未開發的土地，農業工業諸種原料均有相當的分佈，而且均有獨特的文化勢力與社會基礎。這四大區分如能消滅經濟國家主義，停止了世界工業資源的爭奪，各盡其長，以補其短，便是全世界經濟的合作，便給世界永久和平奠下了不可搖動的基礎。

戰後世界的理想組織

如所謂「世界聯邦計劃」，是否有實現的可能，現在尚極可懷疑。但是有了避免戰後的經濟衝突，順利執行世界復興計劃，世界計劃經濟的出現却是必然的。理想的世界經濟執行機構，首先便應是統攝國際貿易和國際匯兌的總機構。戰後各國的出入口貨品數量和質量的分配及匯價的平準，一定要經過這種總機構的議定。這便是初步的世界經濟計劃。各國要配合這個計劃，來決定它本國的生產與分配，整個世界經濟便成爲有系統和有計劃的活動；不致像第一次大戰後因世界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引起經濟恐慌及經濟鬥爭，英美在這次大戰裏已奠定了計劃經濟的基礎；蘇俄在這次大戰中已拿事實證明它的強力的計劃經濟的力量；中國自「國父」發布了實業計劃，便決定了以國家的計劃經濟來迎頭趕上的方針；這四大領袖國的政治，雖各有不同的姿態，但經濟方針却顯露一致的趨勢，便是四大領袖國，要有計劃地加強生產能力和調整分配制度；因之，它們的主

要產業，要漸由受國家嚴格指導的方式而達到公營的境地；民生必需品的分配，要漸由受國家嚴格管理的方式，達到公享的程度。這樣，它們始而內而有健全的國民經濟，培養戰後的元氣；外而具有繁榮世界經濟的力量，以滿足其他各國的經濟要求。換言之，世界和平的基礎，建立在戰後世界計劃經濟的完成；而四大領袖國均須具有執行這種計劃經濟的決心和能力。

四大領袖國中的英美

均是工業先進國具有機器大量生產的能力，他們的分配制度也較易調整。蘇聯在此次戰後，還須經過其已有殊績的工業化過程。只有中國的經濟建設，需要在戰後重新着手。中國產業基礎的薄弱，是舉世週知的事實，中國如不能迅速建立雄厚的機器生產能力，便不能利用本區的豐富資源，以解決偌大的東南亞的民生問題。中國如不能成爲世界這一角的產業中心，全世界的經濟便失去了均衡，全人類的繁榮也就受了損害。結果不僅侵略民族復興的野心，且或將引起友邦之間利益衝突，全世界的計劃經濟亦將因之阻滯。故迅速完成中國的經濟建設，不僅是中國本身的利益問題，亦是全世界的利益問題。

中國工業化是否要走

向資本主義，這是值得研究的。但中國是沒有這樣可能，因爲國父已先定了一個原則，便是「民生主義」。實業計劃是要求生產集中化，民生主義是要求分配社會化。實業計劃是在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下實行的，否則，盲目地談工業化或經濟建設，不僅這種建設對中國本身沒有什麼好處，而且對於世界的計劃經濟也是有害無益。因爲中國人民生活的困厄，是中國不斷發生災害與動亂的主因。中國經濟建設如反走，民生主義的進路，對苦難生活中的大眾，不但沒有處益，而反造成了少數資本家更來剝削他們的話，中國便不會產生健全的經濟秩序和優良的社會制度，結果，經濟建設便沒有成功的希望，中國大眾的生活水準如不能提高，阻就市場購買力的低下而論，亦足以窒息了所有的新興產業。新興中國的工商業

如捨去了本國市場，那就更不適宜於與世界戰爭商品市場。這便是資本主義不能在中國發展的實際原因。況戰後世界既不能不走向計劃經濟的路，這四萬萬多人的經濟生活，如何能讓他在無政府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呢？所以就內外情勢而論，各工業先進國只有竭力助成我們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這樣才是替世界經濟開拓了一個大市場，和一個大原料產地，以助成繁榮世界的計劃經濟的實現。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像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兩大綱領，便是將建設所致的財富，仍舊分配在大眾身上，大眾因之可平等享受建設後的幸福。如四萬五千萬萬人的營養稍微改良一點，食糧工業便要有異常巨大的組織，他們住宅稍事改觀，居室工業便要集合現代所有的建築師；他如行動工具（車，船及飛機等）和衣料的需要，其數字可比現在世界的產量多幾倍。所以中國有民生主義的建設，世界便擴大了無限的市場。中國境域內的特產，有許多是世界人民生活上的必需品與工業的主要原料，中國能在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下，作有計劃的大量生產，世界工業原料始能增加一優良產地。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是蘇俄的經濟制度與英美的經濟制度的融和，和戰後世界經濟的新趨向上吻合；戰後要建設新中國成爲世界和平的柱石，研究世界經濟問題的人，應該是一致起來贊成這種制度的。

總之世界永久和平

的實現，需要戰後的世界先有經濟的和諧，世界經濟的重心，應建立在四大區域的領袖國裏，才足以永遠維持世界經濟的新秩序。因爲中國戰後的經濟建設，是世界和平的樞機，中國經濟建設成功與否，繫於民生主義的經濟制度的建立與實業計劃的實現，致力於世界和平的國際政治家，應有遠大的眼光，竭力協助我們迅速完成這制度與實行這計劃。

（原文載重慶中央日報）

歡迎：批評，介紹，訂閱，



論中國工業化路線諸問題

(一)

沈志遠

一 前言

到今天，關於工業化的必要性，國內經濟學界大概已經有了一致的主張；關於它對抗戰建國的重要性，許許多多經濟學者已經提供了很多精闢確當的意見，這裏大致已無爭議的問題。

實施工業化應該遵循什麼原則呢？大家都會回答說：應以民主主義為最高原則。而在工業化的任務上，民主主義的具體辦法就是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這在根本原則上也是大家一致，沒有異議的。他如工業建設應以國防為中心；工業化應以發展重工業為基礎；以及發展國營事業，實行計劃經濟等等，在根本原則上都是大家一致，沒有問題的。

但是沒有問題的，只是在根本原則上；按之實際，則一般經濟學者中，對於我國工業化，許多根本原則的問題的具體了解，很多還是有問題的。這許多根本原則問題，主要的就是工業化的路線問題。我們從許多論工業化或論經濟建設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許多作者對於我國工業化的路線問題（包括前提、方針、目標、政策等等），實在還缺乏深刻和精確的把握（自然，立論正確分析精密的佳作也不是沒有）。本文却想在進行具體的分析時一一予以檢討。

在本文中，筆者擬就前述工業化路線諸原則問題，概括成爲形式，內容與前提三大問題來分別加以探討，以求正於海內諸明達。

二 中國工業化之形式問題

(甲) 民族的形式以民享爲依歸

從工業化本身工業化而忽略了民族的形式的那種傾向，在抗戰前國內

經濟建設聲浪唱得很高時，表現得最爲普遍而濃厚。當時「建設救國」(實即當時日寇奸細汪精衛所倡的「長期抵抗」的另一面)的提倡者，可以說都犯了這種傾向。這種籠統地高唱「建設救國」，孤立地侈談工業化顯然是錯誤而必然要發展成爲漢奸理論的。而且事實上「七七」蘆溝橋的砲聲早已完全粉碎了這種見解！

這種見解之所以不正確，是因爲：所謂工業化可以由帝國主義的資本，到中國來大大發展工業，也可以由民族的資本來發展。已的近代工業。帝國主義企業在華發展的結果，只會叫中國變成十足的殖民，叫中國老百姓變成帝國主義資本直接的奴隸。……所以單提工業化而不着重指出民族經濟工業化是不行的。(註一)這就是說，我們所需要的工業化，是中華民族自己的，而不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它不但是帝國主義者直接所有，而且絕對不受絲毫的控制或牽制，我們需要民族形式的(而不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形式的)工業化。

抗戰以來，特別是以「抗戰建國綱領」公佈以來。那種汪精衛李頓時式的「建設救國」的投降理論，雖已無人公開提倡，可是不提民族所有權形式，而孤立地高談工業化建設或過分誇大，工業化本身之意義這種的傾向，還是隨處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例如有的人聲嘶力竭地高唱工業化機械化，主張把「所有農、林、漁、礦、商、運輸、金融各業皆受現代工業之支配」；在一切經濟活動中以現代工業爲骨幹，在地域上以工業都市爲中心。……此爲現代國家之經濟條件，「這一切。本身當然都是我們所要求努力企求的。」總而言之，是要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條件都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來，而完全忽略了中國民族當處於被侵凌的地位，中國在實現上述種種條件時，必須特別注意到工業化的民族性問題，必須做到在民

族所有權的形式之下來實現工業化的地步。這種完全忽略民族性的傾向是極危險的；它在眼前雖然沒有像抗戰時一時期那樣的普遍和露骨，可是假如我們不隨時加以警惕，則到了某種新的客觀形勢來臨時（譬如在抗戰勝利之後）一偶一不慎，這種觀念上的傾向，仍有可能變成現實政治上的危險。所以在抗戰日益近利的今天，我們討論或規劃全國工業化建設的基地方案時，要特別警惕到這種錯誤傾向的危險性。要不然，抗戰勝利之後，我們政治上的國際地位是提高了。我們經濟上仍有陷半殖民地附庸地位的危险。

跟上述傾向有密切血統關係的一種傾向，是過分誇大工業的效力。例如有一位經濟學者說：「中華民族的最後勝利，只有經濟發展到現代的水準，完全工業化以後，才有保證」（註二）這種論斷的欠妥是顯而易見的。第一，如果等到「完全工業化之後」，我們最後勝利才有保證，那就無異把最後勝利看成至少一二十年以後的遠景了（因為假如我們蘇聯的工業化來做例證，從新經濟政策的和平建設時期到第二次五年計畫實現全國工業化時止，共有十七年之久，何況我們現在的工業基礎還不如一九二一年時的蘇聯呢？）第二，須知工業化的完全實現，同時也就是建國的完成，那末照前而那種誇大的說法，明明是把建國和抗戰有做同時完成的過程，甚或至工業建國的完成先於抗戰勝利了。

其次我們不但需要民族的工業化，而且還需要以民享為依歸。換句話說，今天中國所需要的工業化，是民族主義的，同時又是民主主義的。為民享為民生（廣義的）的工業化，就是以謀全民（至少是大多數人民）福利及其自由健全之生活為目的的革命性建設。反過來說，它不是要造成以國父所指示的：「私人之壟斷」和「資本之專制」的閉關的建設。因此，我們的工業化建設，不能單着眼於全國各地各產業部門如何如何的機械化電氣化，工業都市如何支配着全國的經濟生活，鐵路交通網如何的密，礦山銀行如何的發達，乃至農村經濟如何托拉施化（Tractoring）等等，而尤須注意到這種機械化過程，是在何種具體的社會條件之下實現的問題。換言之，即須注意到工業化的社會形式問題——即所謂生產關係的形式問題。

我們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形呢？國父早經教誡我們勿「再蹈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之覆轍」，意即不再走資本主義的老路；且歐美今日的資

本主義已經處於秋風落葉的悲境，經濟落後的中國要重新走這條老路，事實上是不通的。另一種形式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的形式。由於我國今日所處的條件和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以前的蘇聯條件完全不同，我們又不可能採用蘇聯形式。他們當時一切有決定意義的經濟命脈均已操在國家手裏，他們當時現代化的產業水準已有相當的高度（革命前的俄國本來已是相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當時生產手段的壟斷者集團已經消滅……這一切條件我們現在都沒有，所以我們不可能採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形式（或制度）。蘇聯式社會主義的實踐，不適合於今日之中國，只有「民主主義，在經濟建設上講，特別是民生主義。民生主義工業化的所有權形式，主要是國有國營，但同時容許私人資本之存在而節制之。這就是國父所提倡的民生主義實業建設的兩大原則——節制私人資本與發達國家資本。而它的依歸是民享，是「以國家實業所獲之利，歸之國民所享」。（註三）

這些原則，在今天已不但為一般經濟學者所公認。而且幾乎人人都若背誦的了。然而要解決實際問題，單靠形式上的承認和公式主義的背誦原則，而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配合着時間，空間和種種現存的實際條件來靈活應用這些原則，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現在國內許多經濟學者在談工業化問題時，關於國父所指示，或「抗建綱領」所規定的種種基本建設原則的闡釋，往往表現着或多或少的公式主義和抽象化孤立化的觀點。

（乙）節制私人資本和發達國資

先來談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問題吧。前面已經說過，因為我們需要建設為民享民生（廣義的）的工業化，所以要遵循節制私資和發達國資這兩大原則去進行。這種原則就是完全正確的。但是當我們從事擬製一個我國工業化建設的實施方案時，我們必須使正確的原則能够靈活地適用於現實的具體環境；這就是說，我們應用那兩大原則時，必須時刻注意到時間空間和社會經濟的種種具體條件。不然就非犯公式主義或犯唱抽象高調的毛病不可。

拿節制私資一端來說吧。

最近一二年來，隨着國營，專賣，統制等等政策的加速推進，國內一部分談經濟建設的人，往往因為反對自由主義（即反對走歐美式資本主義的老路——這是對的）的緣故而陷於極端的統制主義。（未完）

戰後後方工業建設與內遷廠鑛復員

齊植璐

一 今日後方工業的光明面與黑暗面

抗戰以來，由於沿海工業設備的內遷和內地經濟事業的發展，新工廠的設立，與年俱增，以民國二十六年全年開工工廠數基數為一〇〇，加以比較，則逐年工廠增加率，二十七年為二六七，二十八年為五二二，二十九年為六四七，三十年達九二六，三十一年減，仍有六二四，川，康，滇，黔，湘，桂，陝，甘，寧，青各省，在戰前所有工廠數，尚不及全國總數的九，戰時容量及度數，僅各占全國總數的四，和總度數的二，而工廠總數在全國總數的〇，五以下，均極微不足道，但至今日止工廠總數已較戰前增十五倍，資本總額增七十倍，按工人數增七倍，動力設備增十二倍，生產能力，煤，白口鐵，麵粉各增二倍，水，增二倍半，鋼鐵棉紗各增四倍，硫酸增三十三倍，工具機及動力機各增七十至九十四倍，而戰前後方所不能生產之灰口鐵，汽油動力酒精，電動機，燒碱，漂白粉等項，今日也都有大量出品，且其生產指數，迄至飛躍上升之中，由此，不但可證明了若干基本及國防工業生產力之增高，並且還可以反映出二戰工業機械化程度之加大，這就是今日後方工業第一幅光明方面！

但，後方工業的黑暗面是和它的光明面伴隨以供來的，造成它一時繁榮的條件，也就是影響它持久生存的因素，這種裂罅，從三十一年始，即已逐漸表面化，資金的短絀，設備的欠缺，技工的貧乏，幾可成爲各業間的普遍現象，而最近銷場萎縮，和原料的缺乏，更使若干重要工業的發展，愈感困難，前者以「資本品」工業，表現最爲顯著，從機器開工開始，鑽機及器材，灰口鐵，土鐵，耐火材料，焦煤，并連帶影響到電力器材，水泥等工業的生產，後者以一部分消費品工業所受影響爲最大，包括棉紡，棉線，製糖，酒精，煉油，製革及電工，電信器材等工業，在目前能順利運行，正常生產者，祇有酸鹼，肥皂，火柴，玻璃等化學工業，和麵粉，棉油等食品工業，但其在後方全部工業中所占的比重和成分顯非甚大。

綜查抗戰後一般工業之所以能在後方立足，原係爲戰時的特殊經濟環境所造成，但事實上經濟的轉變，過去有於工業發展的有利條件，今日也許反變成工業發展的障礙，如物價的高漲，誠然刺激過工業品的增產，但日前的成品漲價，已從原料，工資，器材，激動了先風，反使一部份工業感到生產和再生產的困難。交通阻礙，誠然造成了一時市場的獨占，但同時也增加了器材，原料供應的困難使一部份工業不得不延緩生產時間或減少生產。國防物資和民生用品需要大量增加，但新工業的增設和工程的創建，終不能毫無止境而造成「假性」的生產過剩的現象。此外，如政府的補助，金融機關的貸款，也必須擇取重點把握中心，而不能普遍沾潤，徒然造成了「救濟膨脹」。觀乎目前後方一部份工業的轉入困境，即可證明這一個演變的趨向，那麼，抗戰結束以後，經濟情態，回復正常，所謂戰時工業的立足條件，勢將全部消失。設政府任其自然，而無有效之保障，則不但今日已表露破綻的棉糖工業，將不易維持，即今日當能順利進行的工業，也必定會顯出其繁榮的假裝，而相偕的走上了凋謝衰退的命運！

二 戰後後方幾種可能發展的工業

戰時後方工業家在重重困難之中，艱苦支撐慘淡經營，裨益抗戰，厥功甚偉。抗戰勝利以後，對於這般工業家，艱難維建的事業，自應認真協助，優予保障，此爲毫無疑義之事！惟保障辦法，是否仍繼續採行保息補助制度，以保障或彌補其因物價波動而蒙受的損失是否仍繼續給予貸款金減免運費，廉收電費等經營之便利，以維持其正常的生產，是否將運用差別徵稅政策，或別區統銷辦法，以繼續保持其內地的市場，對於這一連串問題的答覆，我們認爲應該從我國戰時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加以考慮，易言之，即應該先對後方工業在戰後全國工業建設所佔的地位，加以確定，然後才能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

關於戰後工業的區位分佈，我們主張糾正戰前的偏在狀態，而力謀全國的「均衡發展」，關於工業的「均衡發展」，我們則又主張「區域分工」，而不同意的區域自足，關於工業的區域分工，我們則更主張「分工的條件，國防工業應國防安全重於經濟利益，民生工業應原料依存重於市場依存，依據此次戰爭的經驗，西南和西北是兩個絕對安全的國防工業區，同時，若不能發揮其自然特長的民生工業，也不無發展之希望，所以，在今日所謂大後方的各省區，至少有以下幾種類型的工業，可於戰後繼續存在。

第一，為接近資源的「資本品」工業，後方的礦產資源西南屬於金屬礦，西北則以石油，煤鹽見稱，兩區水力資源，更所在多有戰後除機械，電力等工業均可普遍發展外，并可在各礦區中心，建立起各種以鑛冶為中心的根本工業，如四川的鋼鐵及其附屬之煉焦，耐火材料工業，煉鋼及其連帶之硫製品工業，製鹽及其有關之鹽鹼工業，採煤及其有關之煤礦工業此外如西康的銅，銻，硫，雲南的鋼鐵，錫，銅，鉛，鋅，鉛，鋁，錫，錳，貴州的鋼鐵，錳，鉛，錫，煤，湖南的鋼鐵，鉛，鋅，錳，錫，煤，陝西，甘肅的石油，煤等鑛冶工業及其有關工業，甯夏青海的鑛冶工業，都很有希望！

第二，為利用地利的軍用品工業，川，康，陝，甘各省均為吾國國防中心，戰後自應將若干有關國防的重要工業，如兵工業，機車，自動車，飛機等交通工具工業，電訊器材工業，及其他軍需工業，儘量遷建於內地各工業中心，其已於戰時創建新工廠者更應繼續加以擴展。

第三，為原料便利的特產品工業，後方原料豐富凡戰前原有之特產加工工業，和戰時內遷而獲得新原料之工業，戰後均有發展希望，如各木材業市場，可以建立木材為中心的木材采制造紙，人造纖維等工業，在重要煤礦還可以建立以煤焦為中心的絕緣品，煉油，染料，炸藥等工業前者在樂山，常德，柳州，後者在宜賓，開遠，白水發展都有可能，此外為萬縣，資陽的瓷器工業，內江，貴縣的製糖及酒精工業，夾江瀘陽的造紙工業，重慶精製工業，萬縣，常德，萬縣的桐油榨製工業，寶雞，廣元的棉紡織工業，蘭州，甯夏的毛紡織工業，瀘陽，榮昌的麻織工業，戰前都已具有相當基礎，戰後發展，更無問題！

第四，為接近市場的消費品工業，戰後內遷人口利率東歸，日用品市

場，自將銳減，然四川盆地，湘江流域滇池盆地均屬民物豐阜之區，對一部民生用品均有相當需要，戰後自應擇其競爭力較強之民生工業，如麵粉，碾米，食用油，織布，製革，水泥，玻璃等工業，協助其發展，重慶，湘潭，昆明，蘭州，西安都可能會成爲這幾種工業的中心。將工業勉強安置在根本不具有生存條件的區位，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實是一種很大的浪費，同時對於不適合國策方針的工業，加以保障，由政治的觀點說，也是一件不應有的事，所以主張戰後將後方工業全部留在後方，和主張將內遷工業全部撤回老家，是同樣不正確的觀點，因此我們認為在戰後後方工業的保障，和維持現狀，應該是兩事，某些工業的確應加以有效保障但却不一定要維持其原狀，必須適應時勢從新調整，透過種種有條件的獎勵設施，使各種工業，適應戰後的新環境，而各得其所，然後方才能達到保障後方工業生存的真實目的。這些都是屬於戰後內遷廠礦復員問題的範疇。

三 內遷廠礦如何復員

研究戰後內遷廠礦的復員問題，我們首先應認清中國工業復員的基本特點，即工業復員的建設性，從字義上解釋「工業復員」應該是戰時態勢轉入平時態勢的過程而言，所以在先進各國，其問題的重點，現在把戰時極度擴展的國防工業，轉變到民生工業，如何將戰時過分膨脹的產業資本，生產設備，交通工具，予以適當的調整與消納，如何使戰時動員的士兵和工業勞動者，均有充分作業的機會，但我國為一經濟落後的國家，「進行縮步」；七十餘年的工業化建設，可以說到戰時才真正開始「長期邁進」，戰時的工業動員正是工業建設的一個階段的前奏，戰後自應更爲加強推進，所謂「工業復員」，也只是戰時工業建設的延續，和戰後工業建設的開端，換言之，即是由初步建設到高度建設，由局部建設到全面建設中間的一種調整部署的工作，所以，我們所要求於「復員」的，也不是國防工業的轉移，而是更擴張，決不是勞力，資本，生產設備的更替，而是再補充，不是戰時工業管制政策的停止，而是加強施行。

戰時工業復員，一面要從事於恢復區被掠奪破壞的公營私營的工業之恢復，和敵偽營工業之接收，另一面要從事於後方原有工業之維持，和各種重要工業區新興工業之創建，其工作是相當繁巨的，所以一切復員的設施

，必須依據戰後工業建設的最高國策，對於工業的區位分布，事業劃分，人才支配，資金調度，器材運用等項，為統籌之規劃：

第一、應先依區域分工之原則，確定一全國工業區位之藍本，將各區應發展之工業，分別列舉規定，其無從儲存留必要者，則移之他處，指定適宜區域，指導並協助搬遷，第二、依國營與民營事業劃分之原則，將各種宜於國營及宜於民營之工業，亦應列舉規定，於政府所屬整理沿海區之工業，應加以調整。第三、工業復員時期，所屬技術及企業人才，必感不敷供應，今日國內優秀忠誠之工程師及企業家，大多有收存不遷，集中後方，戰後自應依國家工業建設之中心，而由政府統籌支配，儘量派往沿海區從事接收，整理，重建之工作。第四、復員時期內遷人口回鄉，金錢中心東移，後方工業資金之復員，勢難加以阻止，同時，戰事結束，物價回跌，民間在工業上之投資，決難像戰時一樣之踴躍，故此時政府在對工業投資，應多負相當責任，在經濟條件，較為有利之區域，為沿海區，自可任國內資本和外人資本發展，但在後方，若不劃入公營範圍，而為工人企業家所不願經營之工業，亦須由政府核辦，以資維持。第五、器材設備，至為笨重，運輸頗感不便，抗戰後內遷器材，不過十數萬噸，以之應付戰後建設，定難敷用，且其年久大都相當老大，近數年不甚相當的燃料原料及工人使用後，其殘餘部分之生產實力，定甚低下，是項設備，戰後非但無遷回沿海區之必要，並且將沿海區域現有設備，儘量再度內遷，以資充實，因沿海區海運便利，新器材之補充，至感便利，可無虞設備之不足。

由上可知，戰後內遷廠之復員，除大部分可從發展重工業，仍應繼續存留後方外，其不具備者，自應准許其復員，不過我們應特別指出一點，即所謂內遷廠之復員，並不應以整個各廠為單位的復員，而應拆開為技術員之復員，企業資金復員，生產設備復員，視各廠之性質，分別規定全部復員與局部復員，對此，我們很願意提出幾項具體辦法，以供企業界有識人士之參考。

第一、為「轉地復員」戰時工業多係應時需要而創建，對原料取給之便利未能切實顧到，同時對廠址選擇，多以隱蔽疏散，避免空襲為前提，對市場及交通條件，亦殊爭顧，此實地位上之缺陷，自應於復員時加以調整，使轉移至經濟條件適宜之地。即有遷出一省或一區之必要者，也不一

定遷回原廠或原工業關係的家鄉，如棉紡織可疏散一部至陝西，毛紡織可大部或全部份至甘肅，而不必回到上海，漢口或河南，為求貫徹此「轉地復員」的目標，政府可以用貸款補助，優先運輸，減免運費等，有效辦法從積極方面獎勵復員廠廠向指定區域轉移。

第二、為「轉業復員」。戰爭結束，交通恢復之後，後方立足成問題者，將為各種代用品的製造工業，對這些工業，轉移地位，決不能解決其生存問題，根本辦法，還是將這些工業，轉移生產方向，即所謂「轉業復員」，如戰後桐油製煉代汽油的工業，可改製芬香族油，等有機化學原料與噴漆人造絲之溶劑的適應後方化學工業之新的需要。

第三、為「轉權復員」。有許多廠，戰後雖仍有存在之必要，但工廠業人員，背鄉離井，已歷多年，戰後相率回鄉，自屬人情之常，而在政府立場為整理收復區，工廠事業，亦必須派遺優秀企業家前往工作，此時後方若干民營廠，自應由政府收購或合資經營，或由地方企業界人士接辦，惟後方民營廠，為數甚多，如悉轉由政府經營，國庫將如何負擔，此不無考慮餘地，作者意見，可採取「換廠」辦法。如收復區內敵偽「收購」，「軍管理」，「中日合辦」等方式經營之工廠及附屬企業家以「委任經營」或「租借方式」交予敵偽經營之廠，政府均應無條件的予以沒收。即以此種沒收之廠，讓渡內遷復員企業家經營，而其原在後方之廠，讓相交換，如此既可符維持生產之旨，又可示「以酬有功」之意未識當代賢達，以為何如。

次和前谿先生甲申元旦試筆

張維翰

入境觀風知政肅。使君美意寬延年。
花谿閒筆清猷遠。茗椀深談俗慮蠲。
周甲新篇開歲首。及時好雨濡春前。
此行郡國多晴亢。獨白黔山載雪旋。



戰後我國農業應有之新趨勢

林邁陶

一 次殖民地農業機構之崩潰與新農業之萌芽

戰前我國農業之機構，整個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籠罩之中生成。結果，生產落後，農村凋敝，農民經濟枯竭，影響整個農業至於破產之地步；所有農業之生產，成爲帝國主義工業原料之供給品；而畸形都市之特有繁榮，更爲帝國主義商品傾售之商場，顯然的造成爲次殖民地農業發展之現象。抗戰六年，我國以自力更生之精神，奮然而起，作民族生存神聖之抗戰，遂一躍於次殖民地範圍之外，與英美各國訂結平等互惠之新約，使百年之經濟壓迫與束縛完全解放，而建成我劃時代之經濟動態，脫離帝國主義經濟之羈絆。如是，新農業之開展，隨之而起。所謂新農業者，即我國農業之發展本我國民民主主義之經濟建設，使我國農業之生產能合於工業計劃經濟而成長，得有系統之管制與分配，同時使農業之生產能合於工業之需要而生產。而工業進步亦爲之需要而進步，而達到我民生主義自立立人之經濟政策，使農業可以合理發展，而國家財富得以增強，世界真正和平之基石亦隨之奠定，使世界人類衣食充裕不竭。此次世界糧食會議，以及戰時糧食物資之供應交換與戰後生產之分配，在在皆以和平建設爲出發點，而謀各國間農業生產之資源，得一合理之分配，互相交換各國生產之剩餘，而形成一世界和平新農業之機構。我國將來農業之發展，當不能孤立而生成，尤以我國幅員之廣，人口之衆，土地氣候之優美肥沃，物產之

豐富，將來在工業發達情況之下，農業生產之增加，尤當無限量，是以戰後我國新農業之發展，賴於他國之器械資本而完成我新農業之滋長者當復不小。故我國新農業之構成，一面在於自立，而新農業之完成，則在於立人；是以我國新農業之結構與帝國主義之經濟發展完全相異，亦即新中國之建成，惟由新農業之生成以表示之，將來世界之和平當亦隨之奠定矣。

二 民生主義經濟政策之新農業實現

民生主義之目的在於養民，主要之政策，爲「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故在民生主義經濟制度中所形成之農業現象，主旨在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土地之佔有，平均地權，使耕者有其田，而促進我國農業之發展，在合理生產分配之中而生成，茲就下列二點以述之。

甲、發達國家資本實現大農業制度

民生主義之經濟政策，首在節制私人資本之膨脹，次則以發達國家資本爲目的。總理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曾說：「因爲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節制私人資本，還要發達國家資本。」故新農業之制度滋長，國家當需要有大之土地面積，以經營大量之生產，使工業之器械得以利用，土地使用可以平均分配，尤在新開之土地中，絕不可使土地分割而形成土地零碎之現象，而影響農事耕作不能實行新式器械之應用，亦無從實施生產合作之政策，使大農制度之推行有所阻礙，致農業之資本勞力、土地、組織、均不能達經濟之高峯。是以新農業之實現，不但剷除地主土地之佔有，國家應使用資本收買土地，以經營

國營之農業生產，以增強國富。戰後新農業之發展，對於國營農場以及其
他國家農業生產之增厚，實為急務，倘不出國家之力量，而從事國家資本
之建設，則不足與世界各國之經濟發展相抗衡。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國實
業界中如張季直等，皆明知是時為我國農工業發展最優厚之時期，即在帝
國主義互相爭奪疲憊之際，從事振興我國之實業，故是時有「棉鐵主義」
之政策。乃於蘇北各縣，購買土地，栽種棉花，一面於上海、南通、無錫
等地開設工廠，以爲如此即可以挽回利權，使我國之農業生產合一，即可
以抵制帝國主義經濟之侵略。惟當時資本之投資皆以私人爲限，毫無國家
資本之意念，致大戰結束之後，此私人資本所建成之經濟機構，不但形成
獨佔之現象，且在帝國主義大資本侵略之下，大有秋風殘葉，一落千丈之
勢。然過此大世界大戰，我國將來經濟建設之傾向，當不免在資本主義之
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之經濟發展二者對立範圍之中而建成，故戰後我國經
濟發展之趨向，實我國經濟建設之轉捩點。民生主義之經濟目標，乃解決
人民物質之生活，實現人民之經濟平等，故其主要之中心意義則在於「養
民」，總理會說：「民生主義之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資本主義以賺
錢爲目的，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爲目的。」是以欲實現民生主義之經濟目的
，則非加強國家資本，使地權之便用平均，不至於受資本家所壟斷，而生
貧富懸殊之現象。總理在民族主義第四講中曾明白昭示：「基本實業歸
於富人所有，所以全國實業，都被富人所壟斷，社會上便生貧富不均的大
毛病」而民生主義經濟政策之新農業姿態，即如何增厚國家資本，而經營
大量之生產，使百分之八十之農民，皆有其地從事耕作，而徹底實現耕者有
其田之事實，使新農業之機構得合理而存在，戰後我國新農業之改進，方
可以堅強建成，而庶幾乎有潮流生存。

乙、剷除私人土地之佔有與實現耕者有其田

我國土地之所有權，多集中於地主之手，地主則以其土地租借於貧窮
之佃農，而從中吸取土地生產之利潤。所以我國農業之不振，農民生活之
低落，幾完全由此現象而產生。據二十四年中華民國統計提要之指示，
我國農民人口爲三千二百萬，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七以上，然我國耕地
面積與全國總面積之比不過百分之十而已。似此情形，則我國農民人口之
衆，與耕地面積之小，以及地權集中之現象，其矛盾可以概見。我國佃農
數目之增多，此乃必然之現象，結果使農業之改良生產無從增進，民生生

產之平均地權，即平均分配土地之使用，使農民皆有自有之田地，而從事
耕作，而形成自耕農之現象，使土壤之改良，肥料之增加，皆能加意努力
，使所增加之生產皆爲其所有。關於民生主義第三講中曾說：「農民
問題真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農民應該爲自己耕地，耕出來
的農產品，要歸自己所有……，假使耕田所得的糧食，完全歸到農民，農
民一定是更高興去耕田的，人民都高興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產」。戰後
經濟建設之終極目的，當然在於增加生產，增加生產方法之中，土地問題
之解決當屬首要之工作。土地問題不能解決，則肥料之增加，品種之改良
，虫害之防除，機械之利用，皆不能實施，縱能實施，而所得之利益，亦
皆非直接參加農業生產而終日流汗之農民所有。是以非徹底實現耕者有其
田之政策，則農業之改進與農人生活之改善，將無密切之關係，故戰後新
農業之實現，有賴於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之政策者大矣。

三、農業工業化之形成

人類利用器械而從事於生產之工作，是社會進化必然之趨向，故戰後
我國農業工業化之實現，亦構成新農業機構之必然現象。蓋新農業之存在
，需要有大量之農業生產以及大量之勞動利用，是以新農業之發展，如不
能利用器械之力而增強生產，則我國農業將永遠不能進入新興之途徑與各
國並駕而齊驅。惟農業工業化之形成，非單獨工業化之推行即可完成，尤
在我國工業落後，科學觀念幼稚之時，而農業工業化之推動，非在工業建
設稍有成就之後不可能。再之我國土地零碎分散，農家經濟枯竭，農村
人口過剩，國家資本薄弱，皆足以阻礙農業工業化之進行。是以由農業工
業化之產生，以至實現農工生產之合理配合，苟非實行民生主義之經濟政
策，以促進新農業之滋長，將無法實現。苟戰後中國，尚保守舊有經濟之
機構，而無獨立生存之經濟計劃，則中國經濟之建設必逆運而生，如是則
中國農業生產之原料，便永遠爲世界工業國所吸取，中國將永遠爲工業國
之附庸。然戰後我國農業建設之動態，無疑的進入民生主義經濟階段之發
展；此種經濟發展之步驟，與新農業政策之實現，中國農業工業化之推行
當隨之實現，方合於時代之需要與歷史演變之要求而必然存在。我國六年
來抗戰之目的，亦不過推翻敵人妄想中之「中國農業，日本工業」之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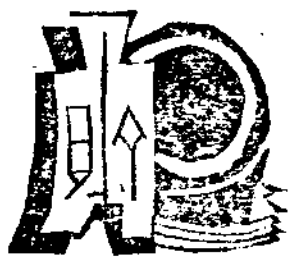
。是以戰後中國農業工業化之形成，在內在之需要與外來壓迫之情況中，為必然實現之傾向，亦惟依此傾向我國方能獨立生存。考世界各國，或以工業而立國，或以農業而立國，其經濟之發展皆屬畸形，英國為工業發達最先進之國家，欲發展其國家經濟之旺盛，則非掠取殖民地農產品不可，以致造成帝國主義之經濟機構，結果戰爭一起，其糧食與工業原料之恐慌竟無法解決，故單獨以工業立國之國家，無農業之基礎，一被封鎖，則所有工業將完全停頓。反之：以單獨農業而立國者，如丹麥、羅馬尼亞等國，以其農業之生產，交換工業國之商品，其國家經濟之動向則受工業國之影響，而成為工業國之附庸。我國此次抗戰，物資之缺乏，交通之不便，物價之高漲，生活之困苦，未嘗非工業不振之所致。以我國天然之地理、礦藏、物產、人力、氣候，皆足以農工業並時而發展，在任何條件之下，戰後我國之新農業發展，當不能與工業之發展背道而馳。農業工業化之形成，於戰後加強生產之工作中，與新農業發展之過程乃不可免之步驟，且為必然之性質無疑矣。

四 世界永久和平之建設與新農業之使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爆發，乃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原料，與擴充國外商場之經濟衝突而引起。戰爭結果，又因經濟調整不得法，使世界經濟形成分立，而加強佔領之局面，造成戰勝國家經濟過分旺盛，資源豐富，戰敗國家之經濟恐慌，資源缺乏之對立現象。故此大戰之重起，完全由於第一次世界戰爭之戰敗國家，因其資源之貧弱與過度經濟發展壓迫之矛盾，與戰勝國家資源之豐富，商品經濟發達過剩之摩擦而產生。是以此次世界戰爭之爆發，為必然之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德國之損失，不能以數字計，且因在工業過度發展情況之下，欲完成其國家經濟之繁榮，滿足食料之供應，非有一戰，不能達其經濟之目的，因此遂又續成第二次戰爭。今後戰爭之勝負可大略決定，德國之失敗勢所不免，惟此大戰後之經濟調整，倘如第一次大戰以後之老態，造成經濟分立之現象，則第三第四次之戰爭必繼之而起，欲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必將成泡影，而

世界真正之和平基石，非有合理之新經濟建成不可，合理之新經濟建成則民生主義之經濟體系最為適用，蓋民生主義之經濟原理在消滅國際帝國主義侵略經濟政策之滋長，同時亦可以緩和共產主義經濟發展之階級鬥爭，總理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曾說：「社會所以有進化，由於大多數的經濟利益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得大多數有利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的原因，就是要解決人類生存的問題。」所以民生主義之經濟原理，在促進社會經濟生產之發展及社會經濟利益之協調，以完成自立立人之經濟觀念，而富足人類生活之需要，使世界各國在同一經濟系統之下，鑄為一體互相捍衛，以產業發達之國家，扶助產業落後之國家，增加生產，以提高一般人民生活之水準，分配合作，使世界人類進入於富強康樂之境地。欲實現此康樂之境地，則合理的新農業之建成其使命大矣。蓋農業為經濟主要之部門，衣食住行所不能缺，我國土地之廣，物產之富，人口之衆，影響於世界糧食衣用居行等之經濟生活，實足以牽動全局。民生主義經濟原則之新農業制度，除中國之新農業外，實足以牽動全局。戰後世界各國之新農業機構之建成，亦得合作，以求新農業之發展合理生成，以世界全人類之利益為前提，增加糧食生產，無飢饉之恐怖，使世界之資源增加，工業之原料隨之充足，整個世界之財富得以增厚。世界農業之發展，更能依據農業之地理。合作生產，在互惠平等原則之下，農業生產落後之國家可以由農業生產前進之國家協助增產。工業原料缺乏之國家，亦可以由工業原料過剩之國家而供給資源，合理配合，合理組合，如美國之小麥亦不至迫於生產之過剩而行焚燬，德國之樹膠亦不至因生產之缺乏由人工製造，倘如是則世界真正之和平方可正式實現，十一中全會總裁明白指示：「我國戰後之經濟，一方面要自力更生，刻苦努力；同時一方面也要與國際經濟相配合，與世界友邦密切合作。」故我國戰後新農業之機構，當在自力更生之途邁進，不能不與世界之新農業結構相聯繫。且世界之新農業之生成，惟有推行我國民生主義經濟原則之新農業，方能得合理之依歸，真正樹立了世界永久和平之基業，進世界於大同。

總之：戰後我國之新農業之實現，惟根據民生主義之經濟原則方能合理，而世界之新農業建成，亦惟以民生主義之經濟制度為準繩，然後新世界之和平方能永久安定，邱吉爾氏所提出之大西洋憲章以及美國戰後計劃委員會所擬之和平短條，方能真正實現於將來矣。（原文載新中華）



戰後建設借款論

高平叔

戰後建設借款是利用外資主要方式之一。這一方式是外國政府或銀行團或外國法人借款與中國政府，助其從事經濟建設的工作，外人僅居於債主的地位。但是，外國政府或外國法人是否樂意把資本借給中國利用，同時中國是否能在有利的條件之下，運用外國的借款，從而興辦事業？這是我們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一

第一、我們要問：外國政府或銀行團或外國法人是否願意借款給中國利用？換句話說，我們將怎樣才能引外國政府或法人樂意借款予中國，供給中國戰後建設之用？為達到這一個目的，我們必須清理以往的舊債，提供戰後整個的建設計畫，確定借款的主要用途，並審劃逐漸付息還本的確實辦法，使外人覺得借款予中國是一格較為安全較為有利的事，因而以其剩餘的資金大量借予中國。我們先從這一方面加以討論。

去年三月，中國政府曾對美第一次成立的桐油貸款，美金二千二百萬元全部還清，頗得美國各方的稱許，美國商務部長瓊斯（Jones）並謂：「中國歷次運美的桐油，已足償付貸款而有餘，中國人民在極度艱苦環境下，能達成此舉，殊堪敬佩。此種特殊努力，不僅表示中國尊重債信的決心。抑且證明中國人民在異常艱苦時期中仍能應付裕如，勇敢倍增，不勝敬仰。」由此可見清理舊債是提高債信的必要措施，同時也是舉借新債

的前提條件。國際間的借貸與私人間的借貸，其關係是相似的，在舊債未清之前，重舉新債實近於不可能，即使可能，其要素條件必規定甚苛。阿根廷公債局長阿哥德（S. P. Agate）於一八八七年的公債報告書上曾說：「阿根廷國家可受飢寒之困厄，但決不廢於債務的履行」。以是阿根廷舉債信用程度，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佔有極高的地位。智利對於外國借款，亦無不按約履行，勞合曾稱讚智利的「財務往來上毫無可供指摘的歷史；外國投入的資本，絕無顧慮其沒收拖欠，或不公平待遇的必要」，所以智利在歐洲證券市場上的信用亦極昭著。其在蘇聯，則自一九二二年蘇維埃政府即以再借新債，並賠償蘇聯當年被各國封鎖時所受經濟損失為交換條件，以致蘇聯在其五年計劃建設中，除對外貿易及特許方式吸收少數外資而外，並未能借得外國政府的鉅額借款。

中國以往所借的外債，在北伐以前，很少用在建設事業上面，又難按期還本付息；國家的舉債信用，一落千丈。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對於外債的整理，頗見成效，近年在外國的信用日漸提高。因而戰時所借的外債竟達美金一、五七七、四六〇、〇〇〇元之鉅。戰後如欲舉借大量的建設借款，我們還應將以往的債務加以徹底的整理，以便愈益其備對外舉債的優越條件。自然，在戰爭結束初期，我們是不會有餘力足以歸還全部舊欠。但我們仍然可以按照本身能力許可範圍，確定分期償還的步驟，務使外人深信中國確有償還舊債的決心，並減除其有被沒收、拖欠或不公平待遇的各種顧慮。

要想舉借新債，我們還須進一步擬訂具體的建設計畫。這可以分作兩方面看：一方面是對內。從對內的方面說，過去所借的外債，往往事前沒

有計畫。其世間的善後借款，數目不小，除供給洪憲運動外，毫無正當開支。其餘則多以「生產事業」為名，實際東拉西扯。我們不能聽任以有限的借款再作無謂的消耗，我們必須使所借借款全部用於經濟建設上面。其次，例如以往借債築路，由於缺乏堅固的鐵路建設計畫，一方面戰前的已成鐵路發生路線交亂，車輛龐雜，機構重複，運費分歧諸種不合理現象；另一方面因為借入與支出項的名目繁雜來源不一而釀成虛糜浪費等等弊端，我們也不能容許這種現象復現於今日與戰後。從對外的方面說，如若沒有具體而週密的計畫，亦將不能促使外人了解中國建設的需要，從而大量輸入外國的資金，康得列夫先生(J. B. Condit)的話很可以代表一部份外國有識者的意見，值得我們注意。他說：

「有人相信世界戰後經濟建設，如資金，物資技術，可能應有盡有，其實不然。似今全體動員，大多數人力與設備用於作戰，一切失調，恐將來不惟無餘，或感不足。且已交出此類設計之國家，深知其需要者為何種，對此有限之物資與人選，似應優先取得。如中國欲居其中之一國，則非及今參照其技術詳情，規劃其精確設計方案不為功。」

我們為什麼要提出具體的建設計畫呢？這是說明我們將來願意還債，並且說明我們將來能够還債。一個國家的舉債能力，大體視其將來的還債能力而定，未來還債能力高者其舉債能力亦大；而未來的還債能力又和所借資金的用途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借債的目的在於發展國內的生產事業，使我們未來的積蓄能力有日漸遞增的機會，則債權人必覺較為可靠，資金較易流入；且因風險較小之故，債權人所要求的條件亦必不至於過苛。相反，如其我們對外借債的目的，僅在於解決經常財政或目前消費的需要，則債權人必不願安心放款；或雖放款而其條件特苛；或甚至目前雖則對我們貸放借款，但當債權人發見我們毫無還債能力時，立即索回其貸出的全部借款。

中國戰前所借的外債，據雷夢先生(C. E. Penner)分析，屬於政府政費者為四二七、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佔總額百分之六〇。二。屬於鐵路借款者為二四八、五〇〇、〇〇〇美元，佔總額百分之三五。〇。屬於其他交通借款者為二〇、三〇〇、〇〇〇元，佔總額百分之二。八。屬於租界市政借款者為一四、二〇〇、〇〇〇美元，佔總額百分之二。〇。戰前借款用於建設方面的僅有鐵路及其他交通建設兩項，合共不及百分之四十

而純粹作為財政支出費用者達百分之六十以上。這就顯成了如屬實初先生所說的(一)借外債以購外貨，結果使進口增加；(二)每年償債無缺，又須舉新債，結果促進進口更增；(三)借債愈多，支付利息亦愈巨，又須舉債，以致債額日見增大的三種循環狀態。

戰時所借外債，截至目前為止，先後共有三十一宗，其中屬於購買建設機械器具材料汽車火車及農工用品者十二宗，屬於購買飛機者一宗，屬於修築鐵路者七宗，屬於準備外匯及調撥通貨者七宗，屬於增強戰時一般財力者二宗，屬於整理中國內債者一宗，戰時所舉外債即已有集中運用於生產事業方面的趨勢，因為屬於購買建設工具材料飛機車輛及修築鐵路的借款，已佔到借款宗數的十分之七。

至於戰後我們願意提供一個意見，貢獻給未來借款給我們的友國作參考。在戰後中國工業化途中，我們是極端需要友國借款的幫助，沒有疑問的，戰後的借款，除了極少數指定作為其他用途外，大部份必然是用在生產建設上面。而且，我們自信，不但具有還債的決心，我們還有在較短期內償還債務的能力。

三

第二、我們要考慮戰後中國是否能在有利的條件之下，運用外國的借款，從而興辦事業？換句話說，我們應用戰後的外國借債，怎樣不使其重蹈戰前的覆轍。為達到這一個目的，我們必須保持運用借款的各種主權；同時，我們希望未來借款給我們的友國能重視中國整個的國家信用，不再斤斤於以關稅鹽稅或路權作為借債的抵押。

以鐵路為例，戰前借款修築鐵路，我們喪失了許多重要的主權，在經營管理權方面，包括建築管理權、行車管理權，及委託借款公司代辦或總工程師執行等，債權人獲得鐵路建設權後，往往兼有經營管理權，如京奉鐵道借款合同內規定「借款未還清前，一切經營管理皆委託英國總工程師」。新奉鐵道借款合同內規定「借款未還清前，聘日人為工程師，營業進款存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又如遼濟鐵路借款合同第十三項規定：「重借款未還清前，本路由福斯公司代為經營，且在合同期間，福斯公司每年得本路紅利十分之二」。

在用人方面，各該總工程師、會計主任、行車及養路總管，多由借款公司指派，如吉長鐵路，舊借款合同規定：「借款未還清前，用日本人為總工程師及會計主任。工程師由中國政府委任適當人物，但須得南滿鐵道會社之同意。會計主任由南滿鐵道會社推薦，依中國政府同意任命之」。第二次吉長鐵道新借款合同復規定：「借款未還清前，業務經營。委託南滿鐵道會社，每年報酬以餘利十分之二。選任日人二名為工務、會計、運輸主任，就中推定一人為代表，執行南滿鐵道會社之權利義務，主任以外之路員由局長與會社代表協定委任」。

在財務權方面，債權人派遣代表駐路。具有稽核出入款項及行車運費之權，如四鄰鐵路借款合同內規定該路會計長應任用日本人，通車後任日人為運輸監督。又如海濱鐵路借款合同內規定，會計主任須得比公司同意，由督辦委任。比國工程師有檢查鐵路收支會計之權。

大致說來，歷年借款修築的鐵路，因借外債而喪失主權，連以上各項在內，約可歸納為下列三項：(一)債權人的參與路局管理經營，破壞了中國政府的鐵路行政系統，並有損中國國防鞏固與安全；(二)債權人控制各路財政，直接影響鐵路新資本的募集與增殖；(三)債權人濫用權力干涉鐵路運價政策，破壞了中國國民經濟的健全發展。

在不平等條約業已撤廢的今日，一方面戰後中國國內與國際形勢已非戰前可比；別方面中國戰後對於外國借款既保證其安全與應得利潤，則其企圖侵犯中國的主權亦已無所藉口。因此，如上所舉的各種弊端，實不應有，同時事實上亦不可能重演於戰後。但是，我們却不能不防微杜漸，預為避免，對於各種借款與辦事，必須慎選適當的主持人員，經營效率不讓於前此代商的外國人員，因為以往外國人侵犯各種事務的主權，往往以中國本國人員經營不良為藉口。對於商訂借款合同，更應注意合約中各項條款，凡有侵蝕本國主權與妨礙本國利益時，必須極力堅持，不稍寬假。以往中國所借外債，多以關稅鹽稅或鐵路收入作為借款的抵押，因而海關行政權及鐵路管理權落入債權人之手。近十年來，由於中國國際地位與國家信用日漸增強，外國對華借款已有逐漸不以稅收或路權為抵押而以華商中國國家信用為保證的趨勢，戰前中美銀借款條文中即已有一借款不用抵押品，以中國之國際信譽為擔保」的規定。民國廿八年的中美信用借

款，卅年的中美、中英平準基金借款，三十一年中的美、中英信用借款，均係以中國國際信用為借款的保證。這些都足以說明友邦對於中國已有了一進一步的了解與認識，如若一個國家採取蘇聯處理帝俄時代所舉外債的辦法，無論其為關稅、鹽稅或鐵路收入作抵押，似乎均不是以保障借款的安全，相反，一個國家如其有償還債務與尊重債權的決心，則她在任何艱難困苦時期或環境中，必仍應付裕如，如期還清，所以在近代國際借貸關係中，應特別重視一國的國際國家信用，而不宜過於短視。我們希望將來借款給我們的友國仍能繼續中英、中美信用借款的精神，重視未來中國的尊重債信與償還債務的決心，而不必斤斤以關稅鹽稅或鐵路收入作為抵押。在過去外國借款中，以鐵路為例，利率最低為五釐，最高為九釐至十釐，尚有平緩京門支路短期借款的利率高至一分五釐之多，當時各國本國通行的利率，通常均在二、三釐之間，至少亦僅四釐，其在中國放款的利率較其在本國放款的利率竟高出一倍以上。此項高利以其須就借款的國力、財政狀況，用途計畫先作詳密研究與考慮，始敢放膽投資，故其利率略高，尚不足怪。其餘如借款折扣自百分之八五、〇至九五、〇，經理用金自百分之二、〇至百分之六、〇，還債用金百分之〇、二五，購料用金百分之五、〇，分紅百分之二〇、〇等項，則均屬不合理的剝削。此外尚有所謂酬金，如津浦鐵路的二〇〇、〇〇〇鎊，滬杭甬路的一〇二、〇〇〇鎊，廣九路的一六五、〇〇〇鎊，明礮暗扣，尤為最不合理的要求，因此以往所舉外債在數量上雖頗有可觀，但中國所能實際取得應用者極為有限；同時，由於折扣同用的重重剝削，愈益提高利率的負擔，本利相加，負債益鉅，支付利息亦愈多，又須借債彌補，其結果乃至不可收拾的地步。戰後中國舉借外債，除在投資方面極力保障其穩妥與安全而外，對於外國借款的利率，於必要時自可予以較其他國際金融市場略高的利率，使其享受較其投資於本國或其他國際市場更為優厚的待遇，藉以鼓勵外國資本的輸入，至於借款折扣、經理用金、還債用金以及酬金等不合理的要素，則必須善為交涉，拒絕予以接受。

四

誠如翁詠霓先生所說「在第一五年內，各項工業建設所需資金，至少為國幣及美金各五十萬萬元，均按戰前價值計算。」以下接第一〇六頁

台灣內幕

(續)

李自修

一七三三年 鳳山吳福星起義，攻楓頭，殺守備官張玉。清援兵至，福星勢孤被殺。

一七七〇年 台南黃教謀反。因以密聚民衆，獲精滑銳，伺機發動。事發，黃教索性攻打台南城，不支戰死。

一七八六年 彰化林爽文發難，破縣城。殺知縣張景燧。又進克嘉義，殺知府劉亨基，都司王克武，嗣分兵向北，連克數城。淡水，鳳山，清廷調福建兵來攻。克爽率三合會衆數千人與抗，血戰數十日始敗，未幾爽文被俘處死。死者不可勝計。

一七九五年 彰化陳周全發動抗戰，殺同知朱慈昌，知縣朱嗣等清吏，後以無援戰敗被殺。

一七九七年 淡水楊水謀發難死之。

一八〇二年 台中白啓謀事，組織小刀會，事洩死于難。

一八〇五年 海寇犯安平，吳淮泗乘機舉事，破鳳山。

一八一一年 宜蘭林永春舉事，攻宜蘭城，不果死之。

一八二四年 嘉義張西領衆，殺官攻城。鳳山響應，有一時之勢。嗣以軍孤旅蹙，敗北死。

一八三九年 台南洪紀敗降，克台南，大田彰化皆有響應，未幾垂敗。

一八九三年 鳳山林供發動革命，同年打狗吳乙亦起義，均無成而死。

一八五四年 吳捷發難。

一八六二年 彰化戴萬生破縣城，陷嘉義，攻大田。計殺清朝官兵無數。南部一帶均入戴手，翌年清以大兵圍攻不屈死之。株連三千餘人。

一八八一年 台南哥老會謀舉事，失敗。首領二人被斬。

一八八七年 彰化林九段落難。

(乙)一八九五年以後

一八九四年清廷因爲朝鮮問題，對日宣戰，結果，陸軍失利平壤，海軍敗北黃海。於是割台灣和。翌年，台灣人民的新厄運，便已具體決定了。清朝替台灣人民換了奴隸主，從此，台灣人民便以用於抵抗滿清的武器來和新奴隸主相周旋。茲將台灣人民抗倭事蹟略記如下：

台灣民主國，一八九五年四月，清廷命李鴻章子經芳爲交割台灣專使，至日艦中，與敵酋樺山資紀交接台灣。樺山資紀聞訊大痛，他說：「余早知有今日矣。然則，台灣者吾台人所自有，焉得任人私相授受。清廷雖棄我，我豈可復自棄耶？」乃首倡台灣自立之說——登高一呼，全台皆應。稍有民族意識者，皆慷慨憤激，力贊會議，於是訂立抗戰建國計劃。丘即草擬台灣民主國臨時憲法，設立立法機關，置內務軍部分掌內政外交軍事。并製定藍地黃地旗，以爲國旗。

一面組織民衆訓練新兵，捐購軍械以備抗戰。舊曆四月廿四，紳民數千，羣詣台北撫署，擁前台灣巡撫唐景崧爲台灣民主國總統。於是民主國告成。旋即宣布台灣獨立於山外，且致電清廷曰：「台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爲島國，永戴聖清。」

因以是年爲永清元年。嗣唐景崧決自守台北，而以坐鎮台南之劉永福爲大將軍，總理南部軍務，另以新訓義軍，把守中部一帶。五月上旬，日本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率兵艦攻基隆。景崧命吳國華守三貂嶺，復令包幹臣往援，初國華駐鎮三貂嶺，日軍頗不得勢，及幹臣到援，因故內門。日軍乃得登陸佔領。八日基隆陷落。九日失八堵，台北大亂。十二午夜，景崧攜一妾一子竄出城，趁英輪內渡。時日軍猶按兵八堵。丘聞景崧去，甲夜趕至台北，圖勸游兵亂民主安內。詎料日軍亦入城，丘乃以義軍擊之。丘大敗，不得已下鄉發動全面游擊戰。景崧去後，台南紳士公舉劉永福爲第二屆大總統。永福佈防，以待日軍七月初，日軍分水陸兩路南下，一面攻克安平，一面進逼嘉義。八月佔嘉義城。八月廿四永福不支，潛逃內渡。於是台灣民主國亡。這一次抗日戰爭統計四萬餘人陣亡，而台島紳民捐出餉錢計在二百萬兩以上。這是割台後抗日鬥爭的先聲。

林大北藍領補等之復國運動。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宜蘭林大北，以光復台灣民主國爲號召，征募志士林季成等五千餘人，圍攻宜蘭街。同時台北藍領補亦以劉永福名爲號召，密集志士，進攻台北近郊。均各以身殉國。是役死傷五千餘人。

一八九六年，劉德杓起義於台東，劉本前清守備官即以原官銜傳檄，號召全台。台北陳菊秋，太平頂簡義，昌林柯鐵，以山鄉青生等首先

集樂響應，未幾台中彰化南投等處亦相率舉事。十一月革命軍攻鳳山嘉義。十二月攻台北及北斗，殺日軍警。然終敗北。死者二千餘人。

一八九八年，陸榮廷舉事于南部，被殺。同志林天福繼起，攻大甲；克潮州，圍垣春城。嗣與日軍相持三年。卒被日消滅。是役死亡六千餘人。

一九〇一年，蔡阿斗糾合同黨，在台中舉事，旋敗身死。同黨黃茂松繼起，攻嘉義，殺日官兵。終于敗亡。死者三千餘人。

一九〇七年，蔡河淋發動革命，擊新竹警署，殺日軍警數十人，嗣後被處死。連座數百人。

一九一二年，劉乾發動農民暴動。攻打竹山日機關，殺死日人多人。嗣亦被捕論死。同年六月，潮亦發難，未幾身死。九月，南投陳河榮又謀革命，事洩被捕。是年，羅福星醜聞大規模革命組織，黨員幾遍全各地。嗣因故，未幾被殺。未及發動，即已被捕殺死。這被株連五萬餘人。

一九一四年，羅阿頭在嘉義一帶秘密組織革命黨。亦事洩被捕。旋以死。據云三百餘人殉之。

一九一五年，余清芳以神命為號召，舉事于台南，自稱大明慈惠國皇帝。計天下大元帥，前衆險被德吧坪之虎頭山，以與日本統治者對抗，日軍警攻之數月，始得佔取該地。余與同志，悉被慘殺。是役計死亡五萬餘人。德吧坪全滅，「完全燬清」，雖無辜婦孺，亦無一存。台人謂之「德吧坪慘案」，今猶歷歷可記。

此外，有如許斐糾集日軍憲兵的礦工暴動，金包里事件，與無數農民為反抗奴化教

育而奮起幽憤日人教員的暴動——芝山巖事件，至今還使日本統治者驚頭；因而設有紀念日，每年例行追悼會。

(丙)有組織的社會運動

其後，由於日本統治者對其殖民地政策有了相當修改，並逐漸放棄野蠻的屠殺手段，而台灣人民亦鑒於過去無謂犧牲之慘重，捨棄無秩序的報復暴動，從事於有組織有系統之文化啓蒙運動，因此，這樣流血慘案就很少重演了。況且，經過日本統治二十年，台灣人民的自衛武器，由於歷次革命的失敗，亦被收沒殆盡了。

廿年代是台灣民族革命運動的檢討時期。歐戰前，福本社會主義在日本，甚為活動。比方祖國的民族革命，也已成功。推翻滿清政權，建立中華民國。這革命的思潮，自然要發台人深省了。歐戰結束，則有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關於民族自決的十四點主張。這對台灣人民的思想行為，有很大的影響。至是台灣民族革命，就着重主義或主張的宣傳，企圖以此組織全台民衆。統觀這時期爭取自由解放的革命主張，概可分做兩種：獨立論與復歸論，前者鑒於祖國革命甫成，國事如麻，對台不能兼顧，主張台民應先自決，然後統一於祖國。復歸論者則以遠大眼光，觀察井估量台灣革命不能單獨成功，所以台灣人民必須投入祖國的革命陣線為唯一救台方法：一俟祖國強大，然後才可以去救台灣，換句話，台灣革命才能成功，這兩種主張，各有各的論據，固不待言，惟復歸論者。從此即陸續回歸祖國去了。

三十年代初年，台中林獻堂，對台灣人民的自由解放，却作另一看法：以為台灣之自由解放可就現狀的修改而獲得。他於一九二一年，與蔡

山水人物

邱吉爾的副官小姐

鼎泰譯自「新聞週報」

最近隨同邱吉爾到開羅去的英國人員中間，有一位曾被新聞記者以至於各界特別注意的，不是布魯克總參謀長，也不是邱吉爾夫人，而是一個穿卡機裙子的侍從副官——邱吉爾的女兒瑪麗。

瑪麗的職務就是照顧她父親一切是否及時備妥帖，是否準時行動，他口袋裏是否還多留着一支雪茄煙，這些事情對於瑪麗在他們家裏是很平常的，可是在外間却十分重要了。

這位首相之女在兩年半以前，擺脫了「唐爾斯十號」周圍的政治紛擾，參加了領空勤務輔助隊，充任下級士兵，並一直生活在營房裏邊。

她請習了高射砲的複雜儀器，同時也一點點進步，被人們稱為具有一「將材」，最後她終於在軍官學員訓練班裏得到了軍官的階級，去年秋天瑪麗接受了火的洗禮。在有一次空襲中她的砲火開始發射，據推測那次空襲落德機一架，但論功行賞時，上輩認為擊落那架敵機的不功她的砲，而是她鄰近的一座。

她是

邱吉爾首相的最幼的女兒，她發覺領空輔助勤務隊的生活較時裝和平時候的倫敦歌舞社會更有意思。她今年正當二十一年，華談起實彈射擊倒比對貴族之家的跳舞會更

惠如林幼春等聯名向日本政府提出「台灣民選議會請願書」。其內容略為：

「……按台灣統治制度，在領台北時，因有參酌台灣固有之文化制度，……帝國議會會於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以法律第六十三號，予台灣總督，以發布命令代法律之特權。自此行政立法二權即歸於同一統治機關……五百餘萬台灣民衆，所受痛苦，實有不可言喻者……即就台灣民意，公選議員，組織台灣議會，作為台灣立法機關。庶幾台民得與日人平等……」

但這一張嘆願書，日本第四十四回議會，并不予注意，祇把它退回作罷。而台灣總督田健治郎，使用種種方法，壓迫這請願書上的簽名者。這樣的請願書，自一九二一年起，至一九二五年，經已提出六次，而每次的聯名簽署者，亦次第加多。然而每屆的日本議會，都對此不聞不問，林獻堂等，於一九二三年，組織台灣民選議會，成同盟會，本擬在台北成立大會，結果日本統治者不准。林等只好到東京去成立此會，到年底才設支部於台灣。台灣支部成立，台灣總督就運用他的特權，把這支部搗毀。十二月十六日早晨，還來了一次全台總檢舉，把從事政治運動者，約莫一千人抓去，要之，林獻堂等估計日本統治者很可與商量，其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侵略者永遠沒有人性！

同時還有一派的人，認為日本統治者可由講道理而放棄他的卑劣手段，可拿民意來克服他。這就是台灣文化協會的看法。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一年，由台北新渭水，連溫卿等領導發起組織，而以文化啓蒙為目標，它的創立宣言有一段：「……在於互相交換智識，扶植道德，並圖教育之

振興，體育之發達，進而鼓勵藝術，喚起一般科學的興趣……」中南部響應而起者，則有王敏川，謝春木、蔡培火，洪石柱，石霜湖等人，他們本欲創立文化義塾，但遭日本統治者拒却，一九二二年，只在台北，台中與台南三地，設立文化講座，每星期六晚上，聚衆演講。惟日本統治者於每次演講，必派大隊警察臨監。講者一不謹慎，則予以大聲「注意」，再則厲聲「中止」，忽又起立命令「解散」。文化講座在這樣壓迫下，終於關門大吉。文化協會亦從事學生運動，其對工人階級的運動，則有數次罷工的效果。

農村出身之簡吉侯朝宗及李應章等，亦著不多與文化協會同時組織台灣農民組合。他們奔走農村，專以暴露日本經濟剝削為務，并密接聯絡農民，抵抗日本統治者經濟榨取，亦曾領導農民與台灣製糖會社作流血的鬥爭。嗣後，農民組合的成員，有一部分與文化協會合流，活動於城市方面，未幾文化協會內部分裂，派生左翼的新文協與右翼的台灣民衆黨，各盡所能，繼續活動。

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的殖民地政策，原本以物力為第一對象。迨至三十年代，由於帝國主義野心的膨大對於侵略戰爭不得不作週密的準備。於是在殖民地，除積極榨取物資外，對殖民地人力的利用，亦逐漸感覺切要。遂對前此屢請設立台灣議會之台人建議，作一重複，允許台灣地方自治——與日本本土現行的相同。并日授意林獻堂等籌組「台灣自治聯盟」，總督府竟有派員參加。繼則以法律宣布「日台共婚法」，獎勵台灣入討日本老婆。日本統治者一面以這粉飾陰謀，一面則以奸猾手段，分化上述台民團體；最後還把這些消滅了。（未完）

來得頭頭是道。她只有在假期時候，和帥自己的朋友一起外出，不然就是協助她母親在城裏或是首相的鄉間別墅招待賓客。她是一個身材相當豐滿，但行動很活潑的女郎，眼睛作灰藍色，說話的時候眼神顯得生氣勃勃，她的談吐頗具乃父這種實事求是的風度，她的興趣是廣泛而多面的，她對於每個問題有她自己的意見，特別可取的是關於戰後問題的意見，她參與戰時服務以來，什麼都沒有大改變，也許唯一的變動是她那棕色的美髮已因限於軍律剪得短了。她把前面的頭髮梳得很高顯得格外精神。

印緬戰區近影

蕭鴻元

日本

自明治維新以來一意整軍強武，侵略勝，一躍而為列強。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又趁火打劫，發了一筆橫財，一直還沒有碰到一個強手，自以為所向無敵，恣驕益甚，乃於一九三七年發動侵華戰爭，想在三個月內把中國一口吞下，再來繼續完成獨霸世界的美夢，那裏知道戰事一打這麼久，中國却是出奇料外地愈戰愈強。「中國事件」不能結束，反而打出一個「大東西戰爭」來，還以為英美現正積極對付德國，一時無暇顧，尚可以逞強一時，那知一個針對他的中美英三國會談又斬機截鐵地定下了擊潰日本方案，決定了日本的命運，真是貪得無厭者禍由自取。

這次 開羅會議的結果，及其重要性。早已詳見報端，對日作戰的通盤計畫，也已經獲得一致意見，中國並正式提出即刻發動反攻綏甸，再看與會的重要將領中，有東南亞

戰後如何處置日本？

Lawrence K. Rorger
張 尚 之 譯

同時，過分膨脹在以前事變中日本境內發生的困難，或者無視於在非軍閥性方向上發展的種種趨勢，都是錯誤的。例如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日本在第一次大戰中雖站在勝利的方面，而且軍事預算減少，但全國卻發生了米的騷動。那是在日本外部的思想潮流，鼓舞了日本人民。非但德國之敗潰，減低了陸軍的威武，即是美國的着重世界民主，宣稱以戰制戰也有着相當的影響。二十世紀中日本在民主政治上之發展甚為有限。也許議會政治的高潮就是一九二九年推翻軍閥化的田中內閣，代之以濱口政府而簽訂日本海軍所反對的倫敦海軍條約。但是當時的政府力量太弱，而日本的警察權力，又是被用作以「含有危險思想」為藉口來阻遏一切民主運動的。

侵略東三省完全是軍人方面的決定，也可以說是對過去若干年中稍發展民主政治的一種改變。結果引起的變動很為可觀，因為「在一九二七年時，有很多獨立的人民團體在未來五年中，不可能發生這種事件的。」而在一九三一年之後，人民對軍閥政治的不信仰，仍可由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及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兩次選舉中看出。但是兩次都引起了不僅止於企圖消滅反對情緒的軍事行動：第一次是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青年軍官們」的叛亂，第二次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的進攻中國。珍珠港事件後，日本高級領袖發表很多暗洩了內部不滿情緒的演說，例如一九四二年八月內務省大臣宣稱「反對政府的分子必須以強力壓抑之……」最近更發表禁止非官方宣傳機關召集的任何人民集會的命令。就這種事情看來，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到一個結論：日本雖然沒有成為民主政體過，但民主的，或者至少是反軍閥性的趨勢在它國土內，是生長過的。

日本境內有些什麼糾紛？

民主情緒的出現雖然值得注意，但即使民主政治家成為很有力的少數集團，日本也許仍會毀滅的。堅決反對現在治權的集團們在某些危險的時機，也許會決定在現有領導及政治之下國家不能再繼續存在。事實上，獲取和平和改變現在日本政府的運動，將成為各種利害衝突所形成的工作，乃是必然的趨勢。因此，此地似宜檢討日本內部的糾紛，而求能在它發見戰敗之不可避免時，計劃如何處置內部問題。

(一) 大企業對軍閥。過去一切希望這兩集團之間發生決裂的念頭，由於日本不斷成功的擴展而歸於泡影。企業集團在軍閥集團的政策還能「發生效力」期間，總命保持和他們合作的。但是如

戰後如何處置日本：一

盟軍總司令蒙巴頓上將，中印緬甸軍總司令史迪威中將，美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少將諸氏，更定以我們相信戰後不僅已有廣泛的決定，必定還有具體的計畫，這樣實際上就是一個對日作戰會議的開羅會議，在歷史上，定佔有重要的一頁，而對於未來安定東亞又奠下了一塊和平的基石。

但是

比較沉寂的亞洲戰場，究竟什麼時候才能熱鬧起來呢？這是一個誰也不敢肯定的問題，但是由於開羅會議的啓示，我們相信，戰期應該有令人興奮的變化，再據會議的本身及其聲名的旨趣以及最近戰局動態與一般趨勢，會使我們很快地聯想到這個印緬甸區，或許是亞洲戰場開始攻擊的前幕，我身處印緬甸區，忝為戰士之一，願就目擊耳聞戰局前途，作一個揣測的分析。

這裏

在地形上是一望無際的森林，在季候上一年裏有七、八個月的雨季，為着適應地形作戰，我方早有特殊的訓練，但如發動反攻則必須選擇非雨季時期，現在這裏的雨季已過，下一個雨季要在明春三月開始，所以推測起來這裏正式發動反攻，當在明春一二月間。

敵人

對於森林戰術，據說較有經驗，但是他們的給養運輸，現已發生極大的困難，原因是我方數月來從未一日間斷緬甸敵後之轟炸，敵人現在已不得不以香蕉樹根竹筍以及由土人撿拾之食物為生，這種切斷敵人後方運輸的戰略，已經收到很大的效果，如果反攻開始，這種戰略必更擴大。

那麼

我們且將緬甸地圖翻開看一看，從南支那以迄曼德里，而至仰光一條

果日本雖然走向潰敗之路時，大企業集團會小會決心和軍閥脫離而謀從破敗中保全呢？在若干年前，這像是可能的，但是在過去十年中輕重工業的全盤合一，以及珍珠港事件以後主要的經濟及工業利益完全和軍閥一致的結果，使日本大企業集團可能常可遭受全部戰敗的危險，而不願自起而建立國民經濟。在這種情形下，企業家和軍閥之間的分裂，是戰敗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任何在二者之間的糾紛，對未來打倒日本抵抗力一舉上，都是有利的。但如果上面的分析沒有錯誤，則聯合國家對日本企業家和軍閥間的合作，似無可以利用的可能，而事實上必須制約這軍和軍閥合作的人民。

(二)大企業家對地主階層。在半封建性農業條件之下，大企業家和地主階層是密切合作着的。這種合作部分地以昔日忠誠馴服的傳統美德，以及鄉村的人口過剩使地租可以提高，工資可以減低的事實為基礎。但如果日本社會開始崩潰，日本農民提出改善生活條件的要求，則部分的大企業，在努力設法對付最困難之環境時，或將與過時之農業體系分道揚鑣，但此種決定惟有以最大毅力始能辦到，此等集團或可在農業現代化之過程中，有發展國內市場（此市場因農民缺少購買力及一般生活水準之落後）之可能。

(三)天皇與官僚對軍閥。雖然據說天皇對一九四〇年的三國協約不滿，而且他的顧問們時常對軍事行動表示不快，但他們從未對侵略行動表示嚴重的抗議。事實上，所謂自由主義份子們援助了一切日本的戰爭，而且始終和「陸軍一起玩着足球」。但這並非說這些團體能和軍閥們同向自滅之途走去。如果聯合國國家行政機關和日本人民的要求有壓迫日本皇室和官僚的充分力量，他們可能支持和平行動以保全自身。

(四)小企業對大企業。這兩集團中的衝突十分緊張，但獨佔事業有其自身發展途徑，以及戰後小企業的發展時，它們不致決裂。但一旦戰敗成爲必然結果時，小企業可能希望早日結束戰爭以避免全盤消滅的厄運。

(以上接第一〇一頁)關於國幣部份，當由中國政府及人民自行籌畫，可無困難，現所欲知者，即各友邦如美國將如何協助我國約值五十萬萬元之器材，以備使用，欲達此目的，自有各種不同之方法，且各人有各人不同之意見，而每種方法，亦各有其利弊；但最切實與簡捷之方法，莫過於以美金五十萬萬元之長期信用貸款，界予中國。我們自然希望戰後第一五年建設資金中的美金五十萬元，各友邦如美國等能以長期信用貸款方式全部借予中國，縱不能悉數以此一方式借予中國，但我們相信其中至少有一部份或大部份以此種方式借予中國的。對於戰後建設的借款，我們主張以整理價值，提供計畫，確定用途，審慎償還等辦法以吸引外國政府或外國法人使其樂意借款予中國，供給中國戰後建設之用；別方面我們則希望借款予中國的友邦能重視中國整個的國家信用，尊重中國與辦理各項主權，使中國能受借款的利而不受借款的弊，在這樣的一個條件之下，我們深信對於未來的中國與未來借款予中國的友國，雙方都會深受其利的。

鐵路線，就是敵人後方的三大重點，要使敵人其線動搖，很明顯地，一定有扼住那進出的要點——仰光，一旦反攻開始，我相信，一隊強有力的盟國艦隊，必定會同時由海面進攻仰光，飛機轟炸敵後的範圍也必更擴大，陸地上再由××與××作戰前進攻，這樣的戰果一定是迅速而有效的；而森林戰所必需的時間可以縮短，犧牲也可以大爲減少。

最值

得我們安慰的是全部公路現在每天都在向前伸展着，勞苦功高的工具，固不一定要等待道路的修通，但這條路在戰略上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擊潰日本已經是同盟國的決心，怎樣擊潰日本，却是一個通盤戰略問題，但無論如何，中國必定是攻擊日本本土的重要根據地，要使中國成爲有力的根據地，一定要突破日本的封鎖線，使軍火物資能源源輸到中國，抗戰七年來國內物價日益高漲，這不啻不是受敵人封鎖的影響。反攻緬甸恢復滇緬國際路線，不僅是戰略上的第一步，在民生經濟上說，也是刻不容緩的事。

什麼

時候反攻緬甸開始，是一個不久就會揭曉的謎，主席由暹羅回國過印時，向我遠征軍訓話沉着而有力地說：「大家要在蒙巴頓總司令與史迪威副總司令的指揮之下，努力戰守，盡忠報國」，蒙巴頓將軍當時也在場，他很感動地說，「蔣主席將這樣優秀的軍隊交給我指揮，很感榮幸」，而在他那「前進，殺敵，打勝仗」的講話中，似乎是給了我們一個重大的啓示，那就是「總反攻即將開始了」。

商務印書館

貴陽分館

啓者敝館中小學教科書業已運到除教育部規定各學校本學期應採用之國定本敝館亦有兼售外所有未出國定本各科均已準備充足歡迎採購

新出版物：

空軍足以摧毀日本論 現代印度
如此日本 外交學
戰時日本財政 歐美禮俗
日本有多強？ 統計學大綱
比較地方自治論 新兵制與新兵法
怎樣做父母 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
中國農佃問題 機械化戰爭論

地址：中華路 電話：三七

中華書局出版

三 大 級 誌

新中華月刊 售價 零售每冊二十元 定購半年一十二元

文史雜誌月刊 售價 零售每冊一十六元 定購半年八十七元六角

中華英語月刊 售價 零售每冊一十二元 定購半年一十二元

歡迎定閱及零購以上凡定閱半年者郵費在內如外埠來函零購另加郵費二元

中華書局貴陽分局謹啓

貴州煤礦公司

發售

塊煤	團焦	巴焦	塊煤	總公司
營業處	營業處	營業處	辦事處	貴陽中華路二二五號
貴陽市巫峯路二〇號	貴陽東郊外巫峯山	貴陽紅邊門外沙河	貴陽紅邊門外沙河	電話掛號七〇〇六號
電話一七九號	電話四六〇號	電話三八九轉七號		電話八〇八號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貴陽分行

電話：營業室 三六五 經理室 八十八

地址：省府路口 中華路

正風書店

門市科

日到新書
歡迎選購

郵購科

備有目錄
函索即奉

批發科

種類齊備
個個從優

地址：中華路三一八號 電話：一八七

電報掛號：二九七三

新亞書店

范氏高等代數學

沈瑤曹盛合譯

葛氏平面三角術

虞詩舟譯

斯蓋倪解析幾何學

董永清譯

舒塞斯平面幾何學

吳靜山譯

舒塞斯立體幾何學

吳靜山譯

天方夜譚

力行教育研究社編

泰西五十軼事

力行教育研究社編

泰西三十軼事

力行教育研究社編

葛立夫遊記

力行教育研究社編

地址：貴陽中華路三一二號

世界書局

教育用品

張字風琴 雞牌臘紙

童子軍號 四號油印機

籃球 複寫紙 上等毛筆
排球 三稜尺 軍用步號
壘球 三角板 硬軟抄本
圓規 丁字尺 各種日記
印油 西信箋 馬利顏料
筆刀 橡皮擦 本牌油墨

文通書局

承接印件

中西書籍 雜誌報章
證券印花 表冊簿記
支票匯票 仿單招貼
石印鉛印 銅版鋅版
製作精良 出品迅速

本局 總發行所 貴陽中華路五一二號 電話七

本省權威報紙

貴州日報

銷路遍省內外

廣告效力宏大

社址：貴陽中山東路

電話：二〇九號

電報掛號：七二四五

貴陽

中央日報

言論正確 消息靈通

編排新穎 印刷清晰

發行普及國內國外
廣告式樣美效力大

承印各種書籍報章

社址：貴陽六廣門外

電話：

社長室 一八三
編輯部 六一一
經理部 二〇四
營業部 七〇二

電報掛號：三三三五